當代社會工作學刊
第六期 2014 年 9 月 頁 124-18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Work
No.6, November 2014, pp.124-181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https://reurl.cc/kd8EpG

# 我工作，但我還是被排除！？
# 低度就業者的工作貧窮困境*

洪惠芬**、李淑容***、林宏陽****

* 感謝訪談資料蒐集期間，研究助理張惠婷小姐協助連絡研究對象、陪伴我進行訪談及監督工讀生製作訪談逐字稿。另外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透過審稿意見提供的指正與建議，筆者及整個研究團隊受益匪淺，然文中若有任何遺誤，仍由筆者與研究團隊自負。

**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通訊地址：111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電話：(02)28819471- 6366。電子信箱: msfenfen@scu.edu.tw。

***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 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102 年 12 月 31 日；接受刊登日期：103 年 6 月 12 日。

# 摘要

壓低失業率一直是政府近年施政的重要目標。然而失業率作為描述勞動市場狀態的指標有其侷限。其中一項盲點是：失業率只能掌握那些調查當下處於「零就業」狀態的人。假使一個人雖然擁有工作但處於美國學者 Hauser 所謂的「低度就業」狀態，那麼他們的就業困境並不會被失業率這項指標所測量到。相較歐洲國家，台灣的失業率一直維持相當低的水準，但我們的就業者其實有相當高的比例屬於「低度就業者」。究竟有多少比例的就業者處於「低度就業」狀態？已有不少學者試圖透過各式量化指標作出估計。本文改由質性研究的取徑去探究此議題。我們深度訪談 8 位就業不穩定者，嘗試透過對他們在就業困境中的生命故事的分析，去揭露低度就業者在經濟與社會上的困境。從 8 位受訪者的訪談文本中，我們看見工作對於他們深刻的內在意義。我們也發現：長時間就業不穩定與工作所得不足對每一位受訪者生命所造成的影響並不侷限在經濟層面。它對生命的衝擊是多面向的。貧窮與工作不穩定會傷害一個人的內在，甚至引發後續的社會適應問題，波及當事人的家人。最後訪談文本的分析也顯示：受訪者之所以長期陷在低度就業的困境，主因出於他們所在工作的所得結構普遍缺乏「基本收入保證」的機制。論件計酬的受僱者、靠佣金抽成的業務性工作者、自僱者、與小農工作者往往因為工作收入缺乏底薪保障，經濟安全的風險相對高。因此本文建議政府應針對勞動人口建構更完善的所得維持體系。



**關鍵字：失業、低度就業、工作貧窮、不穩定就業、社會排除**

# I Work, But Remain Excluded!? The Working Poverty That the Under-employed Experience

Hui-Fen Hung[*], Shu-Jung Li[**], Hung-Yang Lin[***]

## Abstract

Government has taken the decrease of the unemployment rate as the main policy goal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unemployment rate as an index has limitations. The blindness is that unemployment rate only takes account of the persons who has 'zero jobs'. If someone situated in 'underemployment', which American scholar Hauser designated, his employment problem cannot be measured by the index of unemployment rate. Although being compared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Taiwan has been maintained in relatively low level, high percentage of the employees of Taiwan are trapped into 'under-employment'. What percentage of the employees is 'under-employed'? A lot of scholars have already tried to apply various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 Our study switches to use qualitative method to explore such issue. We interviewed in depth with 8 precariously employed persons, and attempted to disclos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ifficulties of the under-employ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ir life stories. According to the text from these 8 interviewees, we observed work has deep internal meaning for them. We also found: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oochow Un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oochow Univers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National Pin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luence that long-term precarious employment and low income level had on these interviewees was not concentrated 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ts impact on their life wa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work instability both might hurt someone internally, and let him trapped into social adaption problems, then diminishing the well-being of his families.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text showed that the lack of ‘basic income guarantee’ of the earning structure was the main cause of these interviewees being constantly under-employed. The employees paid by the piece, the salesperson paid by the sell commission, the self-employed, and the small farmers all lacked the income protection of basic salary, so their economic security was at risk more than others. Therefore, we suggested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 more comprehensive income maintenance system for the labor population.

**Keywords: Unemployment, Under-employment, Working Poor, Precarious ,Employment, Social Exclusion**

# 壹、前言

因為承接政府研究計畫案的關係，我自 2012 年 9 月開始找尋「曾有失業經驗但重返就業」的人們作為深度訪談的對象。由於研究計畫的目的是在檢視現階段對弱勢失業者之就業促進方案的成效，因此研究團隊將訪談對象設定在那些最後成功脫離失業困境的弱勢者。我們期待透過對這些人重返就業的經驗的揭露去探究：弱勢者如何克服找工作過程中的各種困境成功地重返職場？然而進入田野後，我從受訪者口中得到的圖像卻與我及研究團隊原先預想的不同。

我至今仍記得第一位受訪者 A，在訪談一開場回答「失業持續時間」問項時臉上那舉棋不定的表情。當時我對她面對如此「簡單」的提問竟無法給一個明確答案的猶豫態度，感到困惑。隨著我接觸越來越多受訪者，逐漸深入其他與 A 有相似處境的人的生命故事後，我終於明瞭 A 猶豫態度所透露的涵義。大多數受訪者雖然曾經有段時間缺乏一份朝九晚五、有固定月薪的工作，但由於所得維持體系不夠完善，大多數受訪者在欠缺其他所得來源的情況下，為了活下去，都會試著找臨時性工作、或幫忙親人朋友打工，賺取微薄的收入勉強養活自己和家人。換言之，絕對大多數受訪者「完全零就業」的持續時間都非常短暫。正因如此，面對失業持續時間的問項時，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對於大多數受訪者來說，要找到一份工作並不是問題，真正的困難在於：他們找不到一份具持續性、發展性並且有穩定收入、足以讓他們的家庭脫離貧窮的工作。吊詭的是：他們所面臨的就業困境並無法被「失業率」這項社會指標所掌握。因為在現行的失業率指標底下，「勞動人口」[1]只涵蓋兩類人：失業者與就業者。[2]「失業」與「就業」被視作兩種截然二

[1]這裡所謂的「勞動人口」為 15 歲以上可以工作的非在役、不受監管的民間人口。15 歲以上不屬於勞動人口的民間人口者即被歸為「非勞動人口」，包括學生、高

分的概念：一個人只要投入生產性勞動，無論他勞動身份是自僱、受僱、或是家屬工作者，也不管他投入勞動的時間是否足以為他帶來足夠維生的所得，他即被定義為「就業者」。

我當初即帶著這樣的視框進入田野。因此我對受訪者們抱著某種天真的期待：受訪者一旦找到工作，就代表他徹底脫離被勞動市場「排除」在外的狀態，就是成功的案例，其經驗值得其他失業者與施政者參考。但就像美國社會學者 Hauser 等人從 70 年代開始發展出「低度就業」概念（underemployment）所突顯的：勞動市場「內部」同樣存在不平等：一個人即便未被排除在就業之外，他仍舊有可能因為工作時數不足、薪資過低、或其他惡劣的勞動條件而處在邊陲就業的狀態。失業與就業絕非兩種對立的處境，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被擺放在「就業連續光譜」（employment continuum）的概念架構中被重新理解。

壓低失業率向來是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標。[3]不過，壓低失業率只能保證勞動人口中那些處在「零就業」狀態的人數不再擴大。低度就業的概念突顯了：勞動市場不只有外部排除的失業問題，它也有內部排除的不平等問題。失業率的降低，並不能確保那些脫離「零就業」的人所找到的工作，提供足夠的收入、或具備合宜的勞動條件，讓他們得以脫離貧窮、並避免被他人任意剝削的困境。事實上相較於歐洲國家，台灣的失

---

齡者、身障者、因為家庭照顧因素而無法外出工作者（通常以女性居多）、以及其他某些原因而未找工作者。

[2]只要在主計處調查期間，被調查者只要從事有酬工作，無論工作時數長短、當下是否處於季節性或暫時停工的狀態，又或者被調查者為無酬的家屬工作者，每週工作達 15 小時，皆被歸類為「就業者」。

[3]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行政首長以壓低失業作為自己烏紗帽的賭注。例如在 2008 年美國房貸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當年度 12 月失業率破了 5%，隔年也就是 2009 年 7 月甚至破 6%，8 月一度攀升至 6.13%，創新高記錄。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吳敦義在立法院備詢時即承諾 2010 年前若「失業率未低於 5%就下台」。為了達成這項目標，當時各部分努力推出各種短期促進就業措施，終於成功地讓失業率在當年度 10 月跌至 5%大關（聯合報，2010 年 11 月 23 日，A2 版焦點新聞）。

業率一直保持在相對低的水準。然而我們的就業者當中其實有相當程度的比例處在低度就業狀態。台灣的失業率這項指標作為評估人們就業狀態的合適性所面臨的問題，就跟多數福利後進國家相似。福利後進國家由於缺乏完善的所得維持體系，工作收入是許多家庭唯一的所得來源。失業者在生存與養家的壓力下，只要有工作機會，無論工作條件如何，只能將就接受（蔡憲唐、韋伯韜，2004: 9）。

面對經濟全球化下低人力資本與低技術勞工的工作機會不斷隨著製造產業外移而流失的困境，政府陸續投注經費，透過各式就業促進方案幫助弱勢勞動者重返勞動市場。除了透過失業率的起伏去評價這些方案的成果外，我們也該進一步檢視：這些重返就業的弱勢者所在的工作究竟是什麼樣工作？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將焦點移轉到低度就業現象。回顧國內相關文獻，以低度就業作為主題的研究並不多。這些文獻當中有的著重在與此概念相應之社會指標的建構，期望對低度就業的人口數作更準確的估計（蔡憲唐、韋伯韜，2004；蕭霖，2003；顏敏娟、葉秀珍，1997）。有的則藉由對次級資料的分析試圖瞭解低度就業人口中不同性別與產業別的組成狀況（黃冠穎等，2001；Tseng et al, 2002）。本文不循此量性研究的途徑，而是透過質性訪談文本的分析深入那些處在低度就業狀態的就業者的生命細節，去揭露他們遭遇的經濟與社會困境。

無論在學術圈或者政策規劃領域，失業者乃至長期無業者的生命困境往往受到較高的注目。低度就業狀態底下的就業者相較於這群人在處境上雖然有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巧妙的差別。低度就業的勞動者往往因工時不足或薪資過低，無法單憑工作所得養活自己與其家人。因此和失業者與長期無業者一樣，低度就業者亦飽受貧窮的威脅。然而同失業者相異的是：**低度就業者仍舊保有一份工作**。儘管所在的工作稱不上所謂的「好工作」，他們卻勉強自己堅持下去。本文好奇的是：什麼原因趨使他們在條件不甚理想的工作崗位持續停留？除賺錢外，他們能從所在

的工作體驗到更深層的意義嗎？他們的生命品質有因為投入工作而獲得實質的提升嗎？為解答這些問題，下文分作四章。第二章透過文獻整理簡單地回顧低度就業此概念的定義及歷史脈絡外，更多篇幅將放在「工作」複雜的社會意涵。第四章把焦點放在我因執行政府研究案在田野中遇見的 8 位受訪者。這些受訪者中有 7 位處在低度就業狀態。本文將透過訪談文本的整理與分析去揭露這些受訪者在低度就業處境下的生命故事。我們期望藉由這樣的揭露去突顯那些身處在低度就業狀態的勞動者在經濟、工作與社會上可能面臨的困境。最後一章則根據研究所得檢視台灣現況並提出政策建議。

## 貳、文獻回顧

本文的目的在透過質性訪談呈現低度就業者在經濟上與社會上的生命困境。因此文獻回顧分作兩節，第一節將重點放在「低度就業」此一概念本身。除了釐清概念的涵義之外，我們還會試著從「低度就業」這個概念萌生的歷史背景，去剖析此一概念所蘊含的社會意涵。第二節則將焦點放在低度就業者的生命困境。低度就業者與失業者雖然都飽受貧窮的威脅，但兩者的差異在於：前者仍舊保有一份工作。由於本文的研究問題聚焦在：保有工作這回事，究竟對低度就業者的生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因此第二節，我們將同時從「福利依賴」與「社會排除」這兩種角度去討論：「工作」對於當事人的複雜意涵。

### 一、「低度就業」及其意涵

「低度就業」概念是美國社會學者在 Hauser、及他的學生 Clogg 與 Sullivan 在 1970 年代發展出來的人力運用指標。回顧這個概念在 1970 年代前後的發展簡史，「低度就業」作為測量人力運用狀況之指標，當初被

建構出來的目的即在彌補「失業率」這項指標的侷限性。下文先將焦點放在此概念本身的定義與構成元素，再去探究它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意涵。

## （一）定義與構成元素

總的來說，Hauser、Clogg 及 Sullivan 等人是用「勞動力是否得到充足運用」的角度來定義「低度就業」並發展相應的測量指標。相對照於「失業率」將勞動力二分成「就業者」與「失業者」；Hauser（1974）將勞動力區分作「獲得適度運用」（adequately utilized）與「未獲得適度運用」（inadequately utilized）。凡是未獲得適度運用的勞動力皆屬「低度就業」。也因此在 Hauser 等人的論文或專書中，「低度就業」與「未適度就業」（inadequate employment）一詞交互使用；此外，也由於這項測量指標主要是依據勞動力被運用的程度，對勞動人口作分類，因此它又被泛稱為「勞動力運用架構」（Labor Utilization Framework, LUF）。

什麼樣的勞動力才算所謂「未獲得適度運用」？失業者當然算是「未獲適度運用」的勞動力。然而對 Hauser（1974）來說，除了失業之外，一個人進入勞動市場後，還有可能因為工作時數不足、工作所得水準過低、或教育與職業不相稱（mismatch of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等因素，導致他所擁有的人力資本未被充分運用。換言之，「低度就業」指標並未將「失業」此一概念排除在外，而是將之涵蓋在「未獲得適度運用」的勞動力底下；就這點而言，「低度就業」是對「失業率」此一人力運用指標的再擴大。

Hauser（1974）所發展出的 LUF 最初是用於對開發中國家人力運用狀態的測量，爾後他自己以及他的學生們也將這項指標用在美國社會。其中 Clogg 和 Sullivan（1983）嘗試用 LUF 分析美國人口普查局每年定期執行的《現有人口調查》資料（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Clogg 與 Sullivan（1983）將 LUF 用於分析 CPS 資料的同時，也以此資料的變

項為基礎，就 LUF 當中不同類別的低度就業者發展出更具體與明確的操作化定義。相較於 Hauser（1974）最初版本礙於資料的限制僅將低度就業者分作三大類，Clogg 與 Sullivan（1983）不只將低度就業的地位類型擴充成五項，讓此一概念的構成更加細緻，還將納入原本被排除在外的「祛志工作者」(discouraged worker)，使分類變得更為周延。根據 Clogg 與 Sullivan（1983: 120-121）的分類架構，低度就業概念各構成元素的操作定義如下：

**1. 潛藏失業（subunemployment, S）**，即怯志工作者的替代指標（proxy），意指那些「想工作且隨時可以工作，但未找工作」的無工作者。在失業率指標底下，這群人雖有意願工作，卻未採取行動尋找工作，不僅未被視作失業者，也被排除在勞動人口之外。

**2. 失業（unemployment, U）**，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及大多數國家官方失業率指標中對失業者的定義一致：凡屬勞動力，目前沒有工作、隨時可以工作，而且符合以下三種狀況當中的一項者，皆被歸在此一類別：(1）採取特定行動找尋工作；(2）或者已經被資遣（laid off）現階段正等待恢復工作；(3）又或者已找到工作但尚未開始工作。

**3. 低工時（low Hour, H）**，為「非自願部分工作就業者」(involuntary part-time worker)的替代指標。首先關於「部分工時就業」，Clogg 與 Sullivan（1983）採美國普查局當時的定義：凡一週工作時數低於 35 小時即屬之。我國主計處目標同樣是 35 小時。至於「非自願」的部分，Clogg 與 Sullivan（1983: 120）是以 CPS 的問項「受測者是否基於『經濟性理由』(economic reason）而採取部分工時就業」來判定受測者是否為非自願的部分工作就業者，包括：工作減少；材料短缺；工廠或設備整修；調查當週開始新工作或結束工作；以及無法找到全時工作。我國主計處則是以受測者是否滿足於現狀「期待增加額外工作」的主觀感受作為依據。

**4. 低所得（low income, L）**，即所謂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關於貧窮的界定，Clogg 與 Sullivan 採用美國人口普查局每年定期公告之單人戶「貧窮門檻」水準（poverty threshold）[4]再乘以 1.25 倍，[5] 作為判定工作所得不足的依據。LUF 將這項憑據視作就業者理當從工作中取得的規範性薪資（normative wage）；因此當就業者的工作相關收入未達這項標準，**理當**被視作低所得（Clogg et al., 1986: 377）。我國主計處的判定依據並**非**直接套用官方訂定的貧窮線，主要有兩套標準：一是「工作收入截略點」（income end-off point），另一則是基本工資。工作收入截略點是從整體工作收入的「常模」去判定個別就業者所得是否合理：凡偏離「常模」者即屬低所得。主計處將就業者依性別、教育程度與從業身份的差異分成 36 組取每組平均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的 50%作為截略點。相較於 LUF，工作收入截略點的目的顯然在呈現不同特質就業者生產力獲得適度運用後的薪資水準，屬於實然層次的概念，較不具**規範性**意涵。某些分組的截略點因該組別就業者在勞動市場普遍處於較不利的地位，金額明顯偏低。如國小以下的女性受僱者，其截略點為 9,500 元，遠低於行政院勞委會公告的基本工資。因此從 1980 年起，除工作收入截略點外，主計處開始將基本工資納入考量。針對採全時工作型態的就業者，當其分組

[4]美國聯邦政府訂定貧窮線有兩套標準，除了人口普查局的「貧窮門檻」外，還有健康與人群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以「貧窮門檻」為基礎而設算出「貧窮準則」（poverty guideline）。貧窮準則才是行政部門用以確認公民是否具備資格領取相關經濟補助的依據。而 LUF 所採用的貧窮門檻是一種統計工具，是美國政府用以估計貧窮人口的規模的測量指標。貧窮門檻的計算方式相當複雜，不但將家庭規模及家庭組成人口的年齡考量進入，早期務農家庭與非務農家庭的設算原則也不一樣。因此家庭成員數與未成年子女數不同、及戶長的年齡是否超過 65 歲，其對應的貧窮門檻水準也不相同。

[5]由於 Clogg 與 Sullivan（1983）用以界定低所得就業者的貧窮門檻是針對「單人戶」，而兩位成員以上的家庭，因此直接用它的金額作為就業者的規範性薪資，忽略了多數就業者承擔養家責任的事實，過於保守。因此，Clogg 與 Sullivan（1983）循普查局設定相關指標的作法直接將單人戶貧窮門檻的金額乘上 1.25 倍的乘數（Clogg et al, 1986: 377）。

的工作收入截略點低於基本工資時，以基本工資為準；不過部分工時的就業仍維持以截略點作為唯一的判準（蔡憲唐、韋伯韜，2004：17）。

**5.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Mismatch, M）**，是「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的替代指標，意指就業者所擁有的教育成就遠超過他所在職業的要求（Clogg and Sullivan, 1983）。不同類別的職業對教育成就要求差異甚大。針對多樣的職業種類，該如何決定與相對應的教育成就，LUF 主要由「常模」來判定。Sullivan 在 1978 年首度以美國聯邦政府所出版的 Dictionary of Occupational Titles（DOT）對職業編碼系統作為基礎，[6]先將教育程度要求同質性高的職業項目歸在相同類別，接著再取同類別底下全部就業者就學年數的平均數加上一個標準差作為基準點（Clogg and Sullivan, 1983），凡就業者就學年數超過這個基準點，其教育成就即被視作偏離該職業對教育要求的「常模」，該就業者即被歸為「過度教育」。主計處的作法也類似，同樣是由調查資料中求得各職業別就業者平均受教育年數，差別在於主計處的作法則是平均數再加上 25%。

從其內部的構成元素，我們清楚地看到低度就業指標是建立在「一個人的勞動力是否獲得適度運用」這樣的理論架構上。Hauser 等人認為「就業」並不意味著一個人的勞動力必然得到充分的利用。也因此在 LUF，「失業」與「就業」不再被截然二分，取而代之的分野是「適度就業」與「未適度就業」。長期關注低度就業現象的心理學家 Dooley（2003）認為：邊緣性就業者的存在以及成長，突顯了「失業」與「就業」並不是兩種對立的處境。「低度就業」指標讓我們得以從「就業連續光譜」的概念架構，重新界定兩者之間的關係（Dooley, 2003; Grzywacz and Dooley, 2003）。

[6] DOT 是採紙本出版形式，而且其編碼系是以製造業部門的工作為基礎，已無法完全符應美國現今以資訊及服務業部門居主導地位的勞動市場樣態。因此 1990 年代之後，DOT 這套聯業編碼系統已逐漸由採線上資料庫形型的 *The Occupational Network*（O*NET）所取代。

## （二）歷史脈絡與社會意涵？

然而，任何一個概念及其指標的發展脫離不了當時的社會脈絡。失業率作為一項人力運用標的周延性之所以在 70 年代開始受到質疑，原因除了跟這項指標本身的限制外，Jensen 與 Slack（2003: 21-22）認為更關鍵的因素恐怕在於：20 世紀後半葉，開發中國家的小農經濟在快速轉型下、及已開發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陸續遭遇的就業問題，已經超出了失業此一概念所能處理的範圍。

自二戰結束後，失業率成了多數國家測量人力運用狀況的主要指標，它的適當性在美國一直招致批評。不過就像 Moore（1953: 69）所言，這項指標在效度上引發最大的挑戰並非來自美歐這些已開發國家，而是在當時經濟結構仍處「小農社會」的開發中國家。在小農經濟底下，勞動作為商品的觀念尚未紮根，受薪勞動的制度安排亦未普遍；幾乎大多數的成年人都是自僱者或是所謂的家屬工作者。一方面，由於失業率對就業的定義侷限在「具市場價值」的經濟性活動上，小農們飼養雞鴨作為補充自家人食物來源的勞動，並不被視作經濟性活動。這使得那些長期投入這些勞動的小農家戶成員很容易被排除勞動力的範疇之外，導致開發中國家的勞動人口被嚴重低估，也影響其人力運用狀況測量結果的準確性（Moore, 1953）。此外小農工作者即便被納進就業者，但問題是：開發中國家正值工業化階段，在產業結構快速變遷的趨勢下，小農自僱者或其家屬工作者很容易因農村人力過剩而陷入工作時數或工作所得過低的困境。如同前文反覆提到的，失業率這項指標是建立在對就業與失業截然二分的基礎上，這使得它無法掌握普遍存在於開發中國家低工時或低所得的小農工作者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困境。鑑於此，70 年代初 ILO 召集了 Hauser 等勞動統計的學者專家舉辦系列會議，嘗試透過低度就業這項指標的建構對開發中國家的人力運用狀況作更有效的測量（Hauser and Shaprio, 1999: 419; Jensen and Slack, 2003: 23）。

有趣的是，沒多久 Hauser（1974）也將這項指標用在美國社會。他利用該指標對美國 1970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分析後發現：美國的勞動人口中有 20.0%的男性及 18.8%的女性是處在被低度運用的狀態。Clogg 與 Sullivan(1983)進一步用這項指標分析 1969 年到 1980 年的 CPS 資料，結果顯示美國勞動人口中適度就業的比例正逐年降低。1969 年的勞動力中有 79.4%的男性及 73.0%的女性屬適度就業者；但到了 1980 年男性的比例卻下滑至 67.7%，女性則降至 66.9%。也就是說，像美國這種已邁入工業階段的社會同樣有邊陲就業者的存在，而且其人口規模並不算小。

Hauser 認為適度就業人口比例的下降與低度就業人口比例的成長反映了美國勞動市場結構的變遷：「全時且終其一生」的穩定工作正在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部分工時、臨時性與契約性的工作（Hauser and Shaprio, 1999: 419）。這種「不穩定的就業型態」（precarious job）的興起，與 70 年代中期之後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趨勢當然脫離不了干係。經濟全球化迫使雇主採取更彈性的生產過程來因應高度競爭的全球經濟市場。然而彈性的生產往往需要更彈性的勞動市場加以配合才有可能。Bhalla 與 Lapeyre（2004）認為：彈性化的勞動市場某種程度與穩定就業型態及理念是相互衝突的。

從上述很清楚看出「低度就業」這套就業連續光譜的概念架構能被建構出來並受到注目，的確有其特定脈絡。事實上，對失業率與低度就業這兩項人力運用指標而言均不可或缺的「勞動力」概念（labor force）一直到 1940 年才發展出來（Hauser, 1949）。在此之前，西方國家在進行勞動相關調查時，依據的是「有報酬工作者」（gainful worker）的概念架構。在這套架構底下工作被視作一個人的永久「身份」（status），受測者只要擁有某項具市場價值的專業、技能或手藝，就被視作有報酬的工作者，無論他當下是否實際投入某項就業，或是否正在找工作。這套概念架構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濟大蕭條期間陷入困境。1929 年經濟大恐慌之後失業問

題急遽惡化，但由於「有報酬工作者」視職業為身份，是一種靜態的指標，完全沒法掌握當時快速波動的就業者與失業者人口數。換言之，勞動力概念與失業率指標的出現與發展，某種程度是為了回應 30 年代當時西方失業持續惡化的局勢。在勞動力的概念底下，工作成了動態的「活動」（activity），人們會因受調查當下是否實際投入具報酬的勞動，或採取找工作的行動而在「就業」、「失業」與「勞動力」這幾個範疇中迅速流動。

對比失業率指標出現的歷史脈絡，80 年代之後 Hauser 等學者嘗試以低度就業指標取而代之，某種程度也反映了：經濟全球化已經對工業化國家的勞動市場結構產生相當程度衝擊。不穩定就業型態的興起，使得就業不再是經濟安全與生活基本福祉的保證。就像 Tipps 與 Gordon（1985）所主張的，勞動市場「內部」同樣存在不平等。人們即便沒有因失業而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他們仍舊有可能因為工時不足、薪資過低或其他惡劣的勞動條件而處在邊陲就業的狀態。就這點而言，低度就業並不只是一套測度人力是否獲得適度運用的指標；這項指標在呈現「未適度就業者」的人口規模與組成的同時，其實也揭露了勞動市場「內部」的排除與不平等現象。

## 二、福利依賴與社會排除：「工作」的社會意義

綜合前述，「低度就業」指標的出現，某種程度是在回應 70 年代之後經濟全球化對工業化國家勞動市場衝擊的後果：長期無業者的增加與就業不穩定現象的惡化使得「失業率」指標無法再充分掌握一個國家人力運用的困境，也無法完整地描述底層人民在勞動市場的困境。然而若進一步將視野拉大，經濟全球化下無業與就業不穩定問題的惡化，也促使人們開始尋求新的視框來觀看「貧窮問題」。

事實上在 1970 年代之前，「貧窮」在西方工業化國家所建立的福利國家體制中一直被視作「基本生計所得」的議題。在這樣的視框底下，國家

對於身陷貧窮處境者的責任就是透過各式的移轉性支府，包括社會救助給付、社會保險給付或普及性的社會津貼，確保人民擁有足夠的養家所得。然而，這種觀看貧窮問題的視框以及對貧窮的對策，在 70 年代之後開始受到挑戰。整體而言，70 年代之後對貧窮問題的新視框在政治意識型態上並非單一取向，右傾與左傾的論點均有之。右傾的論點中以 80 年代初期在英美政壇蔚為流行、由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所發展出「福利依賴論述」（welfare dependency）最為人所知。左傾的論點中最鮮活的例子莫過於：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期歐洲國家為了突顯長期無業者與就業不穩者所得置乏**之外**的生活與生命困境而逐漸形塑出的「社會排除」概念（social exclusion）。很有趣地，兩者儘管在政治意識型態存在某種對立，但它們對貧窮問題的新解卻不約而同地聚焦在「工作」在金錢所得之外的複雜涵義。當然也由於政治意識型態的區隔，兩種視框對於「工作」社會意義各自側重的面向相當不一樣，下文分點述之。

## （一）工作福利：工作是一種社會義務

新保守主義者對福利依賴現象的關注始於 70 年代末期美國大眾媒體對於當時都會市中心黑人聚居社區（ghetto）內部青少年無業、犯罪與非婚生子問題的報導。1977 年 8 月 19 日出刊的《時代》雜誌（Time）首度用「底層階級」（underclass）來指稱這群問題青少年。Katz（1989: 196）後來回顧《時代》雜誌當時的報導。他認為當時報導之所以採取底層階級這個用語，目的在突顯這群問題青少年與主流社會的隔離不只是在居住空間上的區隔。除了聚居在市容敗壞的都會市中心外，《時代》雜誌深信這群問題青少年所採取的生活方式，往往也「無法用主流價值加以理解」。此外這群人也因為偏差的價值和行為模式而長期地「固著在社會的底層」(stuck at the bottom)，不僅自己連下一代都很難向上流動。嚴格說起來，《時代》雜誌當時對底層階級的定義並不算精確與清楚，但隨著其它

媒體的跟進報導，這個概念與相關的議題仍舊引起了美國社會的注意。黑人聚居社區裡頭未成年的非婚生子媽媽與無業年輕人，大體構成了美國社會對「底層階級」這個概念的主要想像內容。

綜觀 70 年代末期以來媒體對底層階級問題的觀察與分析，這裡頭某種程度反映了社會大眾對貧窮問題某種深刻的焦慮。原先「貧窮」指涉的是人們所遭遇的經濟困境，這種觀看貧窮的視框代表著：只要整個社會能建立完善的所得維持體系，那麼貧窮問題便可以獲得解決。但現在貧窮問題卻和「底層階級」的問題交錯在一起。這種交錯意味著：貧窮問題在某些時候，不純粹是所得不足的問題，它也可能是某群人在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上同主流社會間的歧異與衝突。這種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上的歧異與衝突，顯然不是透過現金給付去補充不足的所得所能處理的。面對貧窮問題，整個社會還必須有其他的解方。

不過也由於底層階級的定義並不是那麼明確，不同立場的人往往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這個概念並解釋問題的成因，因而對底層階級問題自然也有不同的解方。思想光譜當中偏左的人如 Wilson（1987; 1996）即試圖從都會市中心居民的人口結構與勞動市場結構變遷，來分析底層階級現象的成因，並將工作機會的創造視為解決底層階級問題的契機。相對照下，那些立場偏右的人則傾向把問題的焦點放在那些被貼上底層階級標籤的人口群身上。福利依賴論述的立場正是如此。有意思的是，新保守主義者儘管把問題的焦點與解決擺在底層階級身上，但他們卻特別注意這群人長期依賴福利供給維生的行為特徵。他們當然也關注底層階級無業、非婚生子、吸毒與犯罪等價值觀及行為模式的偏差，可是他們更在意偏差價值與行為背後的原因。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底層階級那些偏離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追根究底起來，與他們長期依賴福利的生活習性脫離不了干係。新保守主義者認為，完善的所得維持體系固然可以保障人們的基本生計安全，但是這種保障也同時意味著：

工作，不再是人們維持自己與家人基本生計的唯一手段。如此，人們即使隨意退出勞動市場，他們仍舊可以藉著領取國家提供的福利供給而不致陷入生計困境。在這樣的狀況下，如果工作所提供的所得水準比不上福利供給的水準，有人選擇退出工作，過著憑福利供給維生的生活型態，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如何才能讓底層階級徹底擺脫依靠福利維生的習性？新保守主義者的解方是「工作福利」（workfare）。簡單地說就是國家並不中止對福利依賴者的福利給付，但是在繼續提供給付的同時，國家也要求他們必須接受國家所安排的工作機會。這種工作要求是具強制力的（mandatory）：如果領受者不接受國家所安排的工作機會，國家將會相當程度地刪減福利供給的水準、甚至撤銷領受者繼續領取福利供給的資格。就像 Peck（1995: 10）說的，工作福利是一種「胡蘿蔔」與「棍子」兩種策略併用的解方：國家在提供長期無業的領受者福利供給之餘，還為他們規劃就業服務計畫與安排工作機會，這是「胡蘿蔔」；不過，一旦領受者不領這個情，拒絕參與就服計畫、與國家安排的工作機會，那麼國家也會刪減甚至中止對他們的福利供給，這是「棍子」。

值得注意的是：新保守主義透過國家的行政力量來迫使福利依賴者重新投入工作，他們的目的不只是為了縮減政府對福利供給的支出，這裡頭還有更深刻的用意（Mead, 1998: 103）。因為對新保守主義者來說，「工作」這件事所代表的，不只是養家所得、以及讓國家財政得以維繫的稅收與保費來源而已，它還是公民責任，是人類作為社會一份子對整個社會的義務。

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大將 Mead（1986: 241-242）認為一個人對所屬社會的義務，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是政治義務（political obligation），就是那些受法律直接規範的義務。如果人們不履行這種義務，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制裁的形式包括罰緩、罰金、拘役與監禁等。所以它對人們具

有相當強的約束力。另一則是社會義務（social obligation）。相對於政治義務，它所反映的是那種人們在和他人交往與共同生活時對彼此的社會期待（social expectation）。Mead（1986: 242）認為這種反映社會期待的社會義務包括：一家之主，也就是所謂的「養家者」必須投入工作。[7]社會義務雖然和政治義務一樣，都是整個社會秩序穩定與共同利益維繫不可或缺的東西，但是和政治義務不一樣的是，它不能透過法律的制裁來強制人們加以履行。比方說，我們很難想像：在一個自由社會，國家以法律制裁作為要脅，強制所有養家者投入工作。這簡直違反人權。不過，國家雖然不可能透過法律制裁來強制人們履行社會義務，但是 Mead（1986: 6）認為國家可以透過社會政策來要求人們履行社會義務。「工作福利」措施就是最好的例子：既然有一些福利領受者已經將福利供給當作一種生存策略，捨棄工作這樣的社會義務，那麼國家可以用繼續提供福利供給作為交換條件，要求他們履行工作的社會義務。

## （二）社會排除：工作是重要的生活機會

很明顯地，新保守主義的福利依賴論述是對西方工業國家自二戰結束後普遍採行的福利國家體制的嚴厲批判。而在歐洲發展出來的「社會排除」概念同樣也在福利國家體制的合理性進行反思。1970 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之後，歐洲國家陸續為日益惡化的失業問題所困擾。相較於美國，歐洲國家的所得維持體系更為周延與優渥。這也表示歐洲國家比起美國，更加倚靠工作人口的稅收與保費來支撐所得維持體系維繫下去所需

[7]根據 Mead（1986），由於這種社會期待是整個社會的成員透過彼此長期互動而逐漸建構出來的，因此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會發展出不同的社會期待，它們所反映的社會義務自然也存在著的差異。Mead（1986: 242-243）以美國社會為例指出這種反映社會期待的社會義務包括：每個家的一家之主，也就是養家者都必須投入有酬工作；一個人必須盡其所能地養活他的家人；必須具備基本的語言能力；必須接受足夠投入有酬工作的學校教育；遵守紀律，不只是守法而已，還得尊重他人的權利。

的龐大支出。長期失業或無業問題的惡化，對歐洲國家財政所造成的衝擊必然也更加強烈。就務實面來看，若要維持國家財政的長期穩定，勢必得讓那些因為人力資本不足、或工作技能過時而長期失業或無業的人口重返工作體系。不過，讓失業者重返工作體系，除了務實的考量外，還有「價值」層次的議題。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期歐洲國家嘗試透過「社會排除」概念(social exclusion)的建構和發展，去揭露關注無業、長期失業、就業不穩定人口在所得匱乏**之外**的生活與生命困境。

若追溯「社會排除」一詞的起源，最早是由 Rene Lenoir 在 1974 年所提出；當時 Lenoir 擔任法國席哈克政府的國家社會行動大臣（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social action），他主張法國人口中約有十分之一被政府所提供的福利服務「排除在外」(excluded)，這些人包括「身心障礙者、自殺傾向者、年老失能者、受虐兒童、物質濫用者、青少年犯罪者、單親父母、多重問題家庭、邊緣性與反社會人格者以及其他對社會不適應的人」（引自 Sen, 2000: 1）。往後近 30 年，在歐盟的推波助瀾下，這個概念改變了歐洲人對貧窮及相關社會問題的觀看視框（Saraceno, 2001）。

所謂「社會排除」，簡單地說是指「一種將個人與群體完全或部分地排除在他們所生活的社會的充分參與之外的過程」（引自 Rawal, 2008: 164）。單就定義來看，顯然社會排除這個概念比起「貧窮」要複雜而且難以捉摸。Saraceno（2001）回顧社會排除的相關文獻後發現：這個概念在當代雖然如此受歡迎而且流行，然而多數論者對於這個概念的內容並未形成明確的共識。Silvers（1994）甚至將社會排除這個概念內部不同的理論與政策訴求區分成三種「典範」（paradigms）：「連帶」（solidarity）、「分化」（specialization）與「獨佔」（monopoly）。而這三種典範分別對應三種特定的國家脈絡：法國倚重社會連帶的共和理念、美國自由主義傳統對個人權利的看重、以及歐洲社會民主觀點對不同層級權力關係間衝突的強調。Saraceno（2001）認為不同典範對應特定國家脈絡，反映了「社會

排除」這個概念高度的社會建構性。就像 Paugaum（1996）所說：社會排除似乎是一個社會建構出來評估自身在維繫社會凝聚與個人福祉的表現與風險的政策性概念，而比較不是單純的理論性概念。儘管如此地模稜兩可，不過相較於「貧窮」概念的靜態與單一面向；社會排除對問題的分析取徑更為動態，而且對人們生命困境的關注不再集中於經濟層面，分析面向更為多元（Barry, 1997; Sen, 2000; Saraceno, 2001; Rawal, 2008）。這種動態與多面向的理解角度，讓政策焦點能由原先的物質資源重分配，逐漸移轉到社會成員擁有對社會生活充分參與的權利。這或許是為什麼社會排除最後會取代貧窮，成為歐盟社會政策規劃架構中的核心概念之一(Rawal, 2008)。

雖然社會排除代表一種對貧窮問題的觀看視框，但在多數人的印象中「社會排除」與「貧窮」概念仍舊緊密相關。事實上，貧窮概念對底層人民生活困境的分析方式與研究成果一直是社會排除這個概念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養份。不過 Saraceno（2001）提醒：若去追溯社會排除此概念被建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對這個概念發展產生關鍵影響的論述，其實存在兩套思維體系。除了一般人較為熟悉的「貧窮與物質剝奪」的論述外，「社會瓦解（social disintegration）、邊陲（marginality）、沒有歸屬（un-belonging）、流離失所（up-rootedness）」等相關的論述也對社會排除概念的建構，發揮一定的作用。前者在意的是那些被排除在相關資源與社會權利之外的個體與群體的物質條件。後者看見的是個體與群體如何被排拒在相關而且具豐富意涵的社會網絡及社會共享的價值與身份認同之外的過程。換言之，「社會排除」一詞並不只是對「貧窮」這個概念舊酒新瓶式的修辭改造或新貼標籤（Barry, 1997）。長年致力於「能力」（capability）取徑研究的印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2000）認為社會排除概念的建構對於貧窮現象的理解、原因的探究以及政策的發想均提供「極富新意的洞見」。Sen（2000: 4）甚至進一步將社會排除與

他的「能力」概念連結在一起，指出社會排除概念可以幫助人們看見貧窮是一種「能力」的失敗與剝奪：貧窮代表著當事人沒有足夠的「能力」去過一種最低標準的生活。

有趣的是就像上文提過的，多數文獻包括歐盟的官方文件（Cf. Room et al., 1992）都會宣稱社會排除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multi-dimensional concept），然而在眾多面向的排除中，多數論者最為看重的仍舊是「被勞動市場排除」這個面向。例如前述引用過的 Sen（2000）在分析社會排除與能力概念之間的連結時，即以長期失業作為例子，說明當人們長時間沒有工作，它對當事人所造成的衝擊並不侷限於所得損失。Sen（2000: 19-22）羅列出的相關衝擊包括：由於長時間缺乏從工作中磨練學習的機會，而導致工作技能的折損；自主性與社交生活的喪失；自尊受損對心理造成的嚴重傷害與折磨；自尊受損對健康的負面影響；家庭與人際關係衝突等等。事實上，連歐盟對社會排除概念實際採取的政策操作也側重在就業機會（Cf. Room et al., 1992），這背後的理據就跟 Sen（2000）對長期失業者處境的分析一樣：「工作」顯然是當代人融入社會生活的重要管道。因此當一個人因為長時間失業或無業而失去這樣的管道時，他所遭受的磨難是全面性，絕對不是所得匱乏的問題而已。這樣的論點也獲得相關經驗研究的支持。例如歐盟在 2001 年一項針對青年失業者社會排除處境的跨國經驗研究，低人力資本的年輕人一旦失業後，教育訓練與工作經驗的不足嚴重妨礙他們重返勞動市場；而且隨著退出工作的時間愈久，在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下，他對自己的評價變得低落，也對未來感到茫然，甚至容易染上酒癮、藥癮、並和暴力犯罪沾上關係，逐漸步入一種主流社會所不認可的生活型態（Kieselbach, 2003）。

社會排除概念對工作作為融入社會生活的主要管道的論點，反映出工作對於人們的內在意義（Jahoda, 1982）。如果就像前述引用的 Sen（2000）以及歐盟 2001 年關於青年失業者的跨國研究成果所言，長期失去工作並

非單純的所得損失或所得匱乏問題，那麼反過來說，顯然工作之於人的意義也非純然賺取所得求得溫飽的手段而已。關於工作在所得與溫飽之外的價值，挪威著名的左派社會理論 Jon Elster（1988）說得很清楚：

> 工作—擁有一份提供所得的穩定職業—可以帶來許多金錢之外的好處（non-pecuniary benefits）。它可以是自我實現的機會。人們可以藉著它來贏得他人的尊敬，並建立自尊。它也可以營造一種社會環境，避免人們被孤立。它能強化日常生活的結構，讓人們不致陷入漫無止盡、與疏離的無束縛狀態（freedom）（Elster, 1988: 62-63）。

在看待 Elster（1988）所羅列的這份關於工作非金錢好處的清單時，我們必須注意他對工作的**微妙**立場。在 Elster 的清單當中，某些好處很深刻的，如自我實現，但也有些好處是比較表淺的，如日常生活時間結構的強化；但這當中，「自尊」（self esteem）才是最核心的好處。對 Elster（1988: 77）來說，假使一份工作無法讓人從中建立自尊，就算它能為當事人帶來其他的非金錢好處，如社會接觸或規律的時間結構，這些好處也將失去意義。倘若自尊如此關鍵，我們當然關心：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人們才能從工作中得到自尊？假使有份工作能讓一個人的自我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獲得自我實現，這樣的工作當然能夠讓人建立自尊。但是在當代，除了極為少數的創作者，多數人很難透過工作獲得自我實現。不過除了自我實現之外，還有另一個比較容易達成的條件，而且 Elster（1988: 66-67, 77-78）其實更在意這項條件，就是：人們透過工作而創造出的財貨、或服務是對「整個社會有實質貢獻」（social usefulness）。當一個人投入工作時，無論他的產出是實體的貨物或是沒有形體的服務，他往往能從他人使用他製造的成品或提供的服務，體會到對方的肯定，進而感受自己的勞力付出對他人乃至整個社會的助益。Elster（1988）認為，這種被他人肯定與尊重的感受，正是一個人建立自尊的重要憑據。

值得注意的是：Elster 將一個人透過工作建立「自尊」的條件設定在「對社會作出貢獻」這樣的事實與感受上，他的用意除了在說明失去工作對當事人尊嚴可能造成的傷害，並不是現金給付所能彌補的之外，他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要證立：國家透過補貼而創造出的「人造工作」（make work），根本無法讓當事人從中建立自尊。因為在類似「挖一個洞，然後再將洞填平」（Elster, 1988; 67）這樣的「人造工作」裡頭，人們根本感受不到他們勞動成果對社會有什麼實質的貢獻。Elster（1988: 78）認為：國家與其將資源浪費在這種無法增進人們自尊的「人造工作」上，應該更用心地為那些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失業者創造具有真正意義的工作（real job）。儘管 Elster(1988)目的在批判人造工作政策，但是他論點深具啟發性，而且也呼應了社會排除概念對「工作」的觀點：如果人們投入工作的當下，會透過工作的產出而對他人與整個社會作出貢獻的過程中獲得他人的肯定與敬重，進而建立自尊；那麼工作應該被視作重要的「生活機會」（life chance），是人們得以用來創造更多攸關生命品質的資源、並融入主流社會的重要管道。

## 三、小結

透過第一節的文獻回顧，我們發現「低度就業」指標被建構出來的歷史背景跟 70 年代之後在西方工業先進國家持續成長的就業不穩定者脫離不了干係：這些人雖然擁有工作，但低所得與低工時的勞動條件卻讓這些人無法擺脫貧窮的威脅。然而他們的困境卻無法被「失業率」這項指標所掌握，因為在這項指標的概念架構中，「失業」與「就業」被截然二分。Hauser 等人的「低度就業」指標的目的即打破這樣的二分，試圖透過「就業連續光譜」概念架構的建立去揭露勞動市場「內部」的不平等及對某些就業者的排除。另一方面，西方工業國家在 70 年的勞動市場變遷，不只讓勞動學者對「失業率」的指標作出反省，它也促使整個社會開始尋求新的

視框來理解「貧窮問題」。從第二節的討論，我們發現無論英美新保守主義的福利依賴，或者是歐盟力推的社會排除，在新視框中「工作」在所得「之外」的價值是論述重點。

不過這裡有一問題：兩者所看見的價值顯然存在落差。在福利依賴論述底下，工作是一種「社會義務」。所謂「社會義務」意指人們對其所屬社會應有的責任。在這個觀點下，顯然「工作」是一種「勞務負擔」（labor burden）。在多數人的經驗中，工作的確具備負擔的特性：無論是什麼樣的工作，它都消耗勞動者的體力與心神、並排擠勞動者對時間的自由支配空間。就這點來說，工作對勞動者來說確實是「負擔」。然而有趣的是：在社會排除論述底下，工作卻被視作一種重要的生活機會。在這樣的觀點底下，工作並不是勞務負擔，而是值得追求的「好東西」(goods)。

究竟工作是一種負擔？還是值得追求的好東西？這關乎低度就業者繼續保有一份工作後，他們的生命品質是否因此而獲得實質的提升？下文將透過對 8 位低度就業者訪談文本的分析探求解答。

## 參、研究方法

去年 10 月到 11 月期間我透過研究團隊成員的人脈及社政與就服單位的引介，接觸 8 位「過去曾有失業經驗的弱勢就業者」。[8]透過深度訪談，我意外地發現這 8 位受訪者雖在訪談當下均擁有工作，卻有相當高的比例處在某種工作貧窮或就業不穩定的低度就業狀態。在呈現並分析這些

[8]這裡的「弱勢」並非經濟條件上，而是「就業條件」上的弱勢，也就是那些勞動市場競爭中相對弱勢的人口群，包括中高齡者、人力資本不足者、身障者以及居住在就業機會不足的偏鄉地區。據此我在找尋研究對象時，我對受訪者所設定篩選條件如下，只要符合下述所列其中一項條件者，即符合本研究所稱的「就業弱勢者」：（1）年齡在 45 歲以上的中高齡者；（2）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下，人力資本不足者；（3）居住在就業機會不足之偏鄉地區者；（4）取得法定身心障身份者。

受訪者的訪談文本之前，本章將交代資料蒐集與分析程序與受訪者的基本樣貌。

## 一、資料蒐集與分析程序

我的提問大致分為 3 階段。第一階段為「說故事」。訪談一開始，我會邀請受訪者回想他失業與無業、尋找工作以及就業後的生命變化。為了讓受訪者盡情地說故事，我會採取「多傾聽少發言」的立場引導受訪者以就業歷程作為時間軸，開放地敘說他如何重返就業的生命故事。第二個階段為「情節再釐清」。隨著訪談進展至中間階段，受訪者賦予情節的能力（emplotment）越來越成熟，開始標示出失業及找工作過程中特別重要的事件，並與其他人生事件相互連結，甚至嘗試作出解釋（Miller, 2005）。此時我會跟隨受訪者所創造出的情節，針對某些故事段落追問細節，請受訪者釐清當下採取某些行動的原因，及對後來生命的影響。我在意的故事段落主要集中在兩個部分：（1）當初如何陷入失業困境？（2）找到現階段工作的歷程以及這中間的社會與心理困境？最後一個階段是「賦予故事意義」。在訪談的最後階段，我試著提出一些較抽象、屬應然層次的問題，包括：他對現階段工作的評價？這份工作對他的意義？他以過來人身份對失業或無業者的建議？他對政府政策的評價與建議？我期望過這樣的提問，讓受訪者能跳脫現狀與個人立場，進一步思考自己重返就業的個人性歷程對整個社會的意義。

訪談內容均在徵得受訪者的同意下錄音。8 位受訪者中有 7 位皆為全程錄音，僅有一位因個人穩私考量在訪談過程中兩度中斷錄音。每場訪談的過程錄音檔皆在研究助理的監督下交由工讀生謄寫逐字稿。工讀生必須簽署保密同意書。資料分析分三步驟。首先是全貌式閱讀訪談文本，以概括出對每位受訪者重返就業的整體樣貌。其次是借助質性研究分析軟體 ATLAS.ti 6.2 對訪談文本進行逐字逐句的編碼。最後一步驟則是

透過對編碼的整理與分析，找出不同譯碼間的關聯性，以發展出某些理論洞察。

## 二、受訪者基本樣貌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

| 編號 |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 居住地區 | 婚育狀態 | 就業狀態 | 工作所得(月平均) | 福利身份 |
|---|---|---|---|---|---|---|
| A | 女/45/高中職 | 都會 | 單親，育有 1 子 | 保險業務；殯葬業務 | 20,000~30,000(視業務量) | 中低收入戶 |
| B | 男/38/高中職 | 都會 | 已婚，育有 3 子 | 閥門製造工廠作業員 | 約 24,000 | 中低收入戶 |
| C | 男/49/國中 | 偏鄉 | 單親，育有 1 子 2 女 | 政府部門臨時性就業方案；自耕農 | 約 18,000 | 中低收入戶 |
| D | 女/50/國中 | 偏鄉 | 單親，育有 1 女 2 子 | 成衣廠論件計酬作業員 | 13,000~16,000(視當月完成的件數) | 中低收入戶 |
| E | 女/53/高中職 | 偏鄉 | 單親，育有 2 子 1 女 | 金針菇種植場論日計酬作業員 | 10,000~30,000(視大小月，但一年中小月佔的比例高) | 老大服役前為中低收入戶 |
| F | 女/52/大學 | 都會 | 已婚，育有 1 子 1 女 | 區公所社會救助課職代 | 約 30,000 | 無 |
| G | 男/51/高中職 | 都會 | 單身 | 自營水果攤 | 0~20,000(視身體狀態) | 低收入戶；身障手冊 |
| H | 男/31/大學肄業 | 都會 | 單身 | 服裝飾品工廠行政助理 | 約 20,000 | 身障手冊 |

8 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如表 1。[9]8 位受訪者在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健康狀態與居住地區等各重要社會結構變項的組成上，存在一定的異質性，在就業困境上卻呈現高度的同質性：他們雖然在約訪當下都擁有固定工作，但進一步檢視就其工作所得，他們普遍處於某種被勞動市場「內部」排除的低度就業狀態。

從文獻回顧我們得知：在主計處對低所得者的定義中，全時就業者的判定標準是分組的工作收入截略點與基本工資。2012 年的基本工資為 18,250 元，從表 1 的整理，只有 D 符合主計處的標準。不過若採用 LUF 的操作性定義，以官訂貧窮線作為標準，則 8 位受訪者當中有 7 位處在或曾經歷過某種「有工作所得，但所得水準卻無法維持其家庭基本支出」的工作貧窮狀態。由表 1 可看出： A、B、C、D 及 G 具備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的福利身份，符合官訂貧窮線對貧窮的定義。E 和 H 的經濟狀態較不明確。H 每個月固定受僱的薪資為 2 萬元。E 的工作收入相當不穩定，大月時薪資可達 3 萬元，但小月時卻只有 1 萬，若用大小月各半估

[9]受訪者的平均年齡 46.1 歲，雖偏高，但就組成來看，45 歲以上 5 位，45 歲以下則佔了 3 位。就性別的組成，男女各居半數。而就健康狀態的組成，有 3 位受訪者領有身障手冊，分別為 D、G 與 H。其中 D 自小即有嚴重聽力缺損的問題，但直到先生過世後因家庭經濟困難為申請現金補助，才在宗教慈善組織志工的鼓勵下申請取得身障手冊。G 則罹患呼吸系統的慢性疾病，後來雖治癒但肺功能已嚴重缺損無法自主呼吸，必須長期配戴氧氣機。H 因為軟骨發育不全的先天疾病導致身高無法發育到一般成年人的高度。在居住地區的組成上，由於本研究當初透過新北市與南投縣社政及就服單位的協助媒介合適的研究對象，因此 5 位居住於都會地區的受訪者，全為新北市住民；而 3 位居住於偏鄉地區的受訪者全是南投縣國姓信義魚池山區一帶的住民。在教育成就的組成上，最多為高中職畢業者，含大學肄業，共 5 位，其次為國中畢業者，2 位。這樣的組成符合一般人對就業弱勢者普遍為人力資本不足者的想像。比較特別的是，受訪者 F 擁有大學文憑。從訪談文本來看，F 重返就業的樣態的確與其他不具大學文憑的受訪者存在很大的差異；然而由於 F 現年 52 歲為中高齡者，她在找尋工作的過程同樣因年齡的原故而遭遇不小的挫折，這是其他 4 位同為中高齡的受訪者共有的困境。

計，平均月薪與 H 相當，約 2 萬元。這個金額仍稍高於 E 與 H 居住縣市對「中低收入戶」的所得標準。[10]然而社會救助法對貧窮線的計算是以家戶為單位，由於未蒐集到 E 與 H 家人的工作所得資料，因此無法掌握：E 與 H 現階段偏低的薪資，對其家庭經濟的影響。我們從訪談資料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兩人的人生當中曾經有一段時間因收入微薄而需倚靠國家的福利給付或家人的接濟才勉強維生。[11]雖然 E 與 H 現階段不符合官訂貧窮線對貧窮設下的標準，但他們過去均經歷過收入不穩定、或者收支失衡的經濟困境，工作貧窮對他們而言並非陌生的生命經驗。

唯一無法放進到工作貧窮類別的受訪者是 F。而且按 LUF 的分類架構，嚴格說起來，F 幾乎無法被歸類到任何一個低度就業類別。不過由於 F 結束安親班的經營後即陷入就業不穩定的狀態。她的經驗或許可以映照出：勞動市場在工作貧窮面向之外對就業者的內部排除。本文因此將其訪談文本一併分析。

## 肆、研究發現

由於本文聚焦在工作的保有是否對低度就業者的生命品質有實質的助益，因此以下的文本分析將焦點在低度就業者在「工作」當中的經驗、感受與處境。全章分作三小節，前面兩小節是對「工作」的微視層面討論。在文獻回顧的最後，我們指出了「工作」之於人的兩種意涵：一方面它似乎是一種會佔據人們自主時間、損耗人們心力的「勞務負擔」，另一方面

[10] H 居住於新北市，E 居住於南投縣。2013 年度新北市中低收入戶標準為：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平均所得低於 17,748 元。台灣省 15 縣市的中低收入戶標準則為：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平均所得低於 15,366 元。

[11]以 E 來說，E 在約談當下雖不具備中低收入戶身份，但有段時間她 3 個孩子都處在就學階段，她曾一度取得這項身份；後來是因為最大的兒子畢業去服兵役，中低收的身份才被取消。而 H 曾有段時間自營服裝修改店，當時的收入扣除掉成本，其實是賠錢。那段期間 H 是靠著家人的接濟才勉強維持溫飽。

它又好像是一個可以讓人從當中領受某些非金錢好處的「好東西」。從訪談文本，我們發現這兩種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意涵，其實同時存在幾位受訪者對對「工作」的實際體會當中。因此第一節先呈現受訪者從工作中體會的某些正向的感受；第二節再就「勞務負擔」的角度去解析惡劣的勞動條件對受訪者生命所造成的影響。

個人在微視層次的生命經驗，絕對與個體的「外在」結構有密切關係。受訪者們在「工作」體驗到各種美好與困厄，與台灣當下的勞動市場結構脫離不了干係。因此在本章第三節，我們試著由訪談文本中歸納出受訪者身陷低薪工作與不穩定就業的「外部因素」。我們發現受訪者普遍不佳的勞動處境，某種程度是其勞動力被高度「商品化」的後果所致。

## 一、工作是值得追求的「好東西」！

從表 1 可以看見 8 位受訪者所在的職缺普遍為低薪、極度消耗體力，而且知識與技術門檻也不高，均稱不上所謂的「好工作」。然而受訪者們並未因此失去對工作的投入意願與付出。整體而言，這 8 位受訪者不僅工作動機強烈，他們對於工作的態度亦屬認真與積極。有不少受訪者談起自己的工作內容時，還不經意地表露出他們對工作的喜愛與熱情。整體檢視訪談文本，我們認為受訪者對工作的高度信念，就像前述我們引用 Elster（1988）的論點，有很大的原因來自於他們看見了工作在金錢所得**之外**的意義。對許多受訪者而言，工作不只是養家糊口的工具而已，它還有別的好處。

### （一）工作作為學習新事物的重要場域

當這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受訪者 H。H 在新北市某服飾製造工廠擔任行政助理。由於過去從未做過文書與庶務性質的工作，他不太能適應現在的行政助理工作。在講述現階段工作的挑戰與挫折時，H 不斷用

「還滿好玩的」這句話作為註解（H: para. 153, 193, 281, 519, 562）。事後分析文本，我發現這種用語習慣除了映照出 H 樂天知命的性格外，[12] 透過將工作與「玩」相互連結，這某種程度也意味著：工作對 H 而言，不僅僅是養家糊口的工具，它就跟「遊戲」一樣可以為生命帶來樂趣（joy）。

一般來說，人們會將「玩」用於「遊戲」這類的活動。對每位參與遊戲的人來說，遊戲過程並非完全順遂；以下棋為例，遊戲就跟很多職場上的工作一樣充滿挑戰與難關。然而下棋這種遊戲「好玩」的地方就在於：當玩遊戲的人克服挑戰後，他可以從克服過程中學習到新事物並獲得成就感。H 透過「玩」這樣的用語將工作類比成「遊戲」，某種程度也反映了 H 視工作為讓自己持續學習到新事物並不斷成長的機會。

> …現在這個行政助理是正好湊巧啦。然後主管人也不錯，主管人也不錯，他…就是他身上也有一些東西可以學。（H: para. 497）
>
> …對啊，你看又一邊工作，一邊賺錢，又一邊可以學到新東西，很好。（H: para. 501-501）
>
> …只是要怎麼講咧…只是要出去玩一些不一樣的，你回來才能做一些更好的東西。（H: para. 509）

H 將工作看作學習新事物的重要管道，這使得他能夠更正向地面對工作中的各種困境。

## （二）工作是建立身份認定的重要依據

除了作為學習新事物的機會，工作對某些受訪者更深刻的意義在於：定義自我。訪談時有不少受訪者表露出渴求未來能透過穩定工作找到自我定位的強烈期待。受訪者 F 或許因為教育程度較高，表述尤其清

[12] H 罹患軟骨發育不全的先天疾病。疾病不僅使他無法擁有一般成年人的身高，也折磨他的身體，讓他從出生起就反覆地進出醫院進行手術治療。或許病痛的歷練讓他能夠用更「正向」的態度來面對工作上的挑戰與挫折。

晰。約訪當下 F 在區公所社會救助課擔任的職務代理人，不過訪談結束後再過幾天她的聘約到期，工作就沒了。儘管就業不穩定，但因還有先生提供穩定的收入，F 並未像其他受訪者處於工作貧窮的低度就業狀態。F 的就業經歷相當豐富。兩年前她將自營的安親班轉讓，並透過就業服務站的輔導與轉介參加婚禮顧問的職業訓練課程。她再三強調那是「非常紮實」的課程（F: para. 227）。可惜的是，課程結束後因年齡的限制，她並未順利成為婚禮顧問。就服站最後媒介她到現在的職代工作。F 人生最沮喪的時候就是婚顧課程結訓後找工作的那段期間。當時她覺得自己沒有「未來」。

> …那我就跟他講說你要告訴我，企業主要告訴我：***我的未來在哪裡？***你不要告訴我，今天我這個年紀是我沒有未來。（F: para. 451，斜體為筆者自加）

從 F 講話時的語調與用詞及她的自我揭露，我清楚地感受到她是十分有自信的人。但那種在職場上找不到自己「未來」的無力感，仍舊對她的自我評價造成嚴重的衝擊。

> [衝擊]非常非常大。…就發覺，職場不是告訴你說，譬如說妳可能要半年的時間，再去受教育，再次的教育訓練，那妳就可以再回到職場，那他現在告訴妳的是說從此沒有妳的位置，那妳現在要怎麼辦？（F: para. 459）

F 先前的人生重心放在兩個孩子身上。但孩子上大學後不再像以前那樣依附她。她需要透過工作來重新定義自己。她積極尋找管道，發現婚禮顧問工作是不錯的契機。沒想到這樣的期盼卻落空了。那種落空對內在衝擊並不純粹是被雇主拒絕錄用的挫折感而已，而是：她不確定自己未來是否還有機會透過職場上的表現來發展自我，建立自己的身份。

在當代，工作是人們建立身份認定最重要的依據。現代人與不熟悉的人相遇，需要相互介紹時，「工作者」的身份（包括在那個工作組織的

工作，職位名稱）是一個人向陌生人定義自己與定義陌生人的重要依據。因此「在哪高就？」成了正式社交場合陌生人碰面時常見的開場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的開場白映照出現代人對於「沒有工作，即沒有身份」的焦慮感。F 所受的內在衝擊多少也隱含這種焦慮。

## （三）工作是一個人建立自尊與獲得他人尊重的重要來源

除了學習新事物與定義自己外，受訪者樂在工作的原因還包括：他們看見自己的勞動成果對社會的貢獻。受訪者 A 就是很好的例子。A 兼了兩份工，保險銷售與葬儀業務。訪談快結束時 A 提到未來會將重心轉移到葬儀工作。問她為何不乾脆結束掉業績不好的保險銷售工作，她講了一個我沒料想到的原因：因為她曾承諾過客戶絕不會讓他們的保單成為所謂的「孤兒保單」。

> …客戶就跟我講一句：「我現在跟妳買了，妳會不會做半年一年然後就走了，啊我又變成孤兒保單。我那時候有跟客戶講一句話：「妳繳多久，我就做多久。」（A: para. 365）

換言之，A 並不完全用「市場交易行為」來理解她與客戶之間的關係。這使得她相信自己對每位客戶都負有持續提供售後服務的責任。事實上在訪談過程中，A 一直強調自己雖從事業務工作，但不是每樣東西她都願意賣。A 自豪地向我表示：儘管業績不佳，但她有自信自己賣給客戶的商品，無論先前的保險或是後來的葬儀服務，都是對客戶有實質助益的東西。她說：

> …我不是因為要去賺很多很多很多錢。因為早期我們那個保險界的那種前輩啊，每次要去徵員要幹嘛的都會秀薪水單啊，她一個月領一二十萬、二三十萬。我說：「這個妳不要給我看，因為我看那個沒有意義啊。」嘿啊因為你要想說：這一份保單你賣出去，對人家的幫助在哪邊？（A: para. 257）

A 在她的保險業務工作上看到她的勞動對客戶福祉所作的「貢獻」；她深信：那些向她買保險的人未來遭逢保險事故時，將因自己規劃的保單獲得合理的理賠金額，進而緩解意外對家庭經濟的衝擊。A 同樣也在現階段較為看重的葬儀工作上感受到自己勞動成果對社會的「貢獻」；而且這種「對社會有貢獻」的價值感，還可以透過客戶的感謝而直接獲得確認。

> …我幫這個往生者好好的那種服務圓滿之後啊，***家屬對我的感謝，哎那個不是用錢可以講的，嘿啊我要的是那種感受。***（A: para. 373-373，斜體為筆者自加）

上述的文本完全呼應了我們在文獻回顧引用 Elster（1988）「工作是一個建立自尊重要憑據」的論點。這或許是為什麼很多的受訪者都告訴我：他們最想要的不是補助，而是一份穩定的工作。倘若工作蘊含如此深刻的內在意義，一個人沒有工作，不只是沒有錢，也代表這個人有可能面臨不知如何定義自己與失去尊嚴的困境。受訪者 G 的故事發人省思。前面文獻回顧曾提到：在「社會排除」論述中「工作」被視作當代人融入社會最重要的管道。底下，G 戲劇性的遭遇具體地呈現：一個長期因工作不穩定而被排拒在主流社會之外的社會邊緣人，如何透過「工作」找回尊嚴、並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定，進而重新融入主流的社會生活。

G 目前在市場擺水果攤。35 歲那年他因罹患呼吸系統的慢性疾病而中斷原先玻璃容器製造工廠的作業員工作。疾病嚴重損害他的肺功能，病癒後他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從事體力型的工作。長達 15 年的時間他陷入到處打零工、居無定所的狀態。無依無靠的他輾轉流浪於花蓮、台東、台北與高雄等地。只要聽朋友說起某個地方缺人手，他就去試試，「**等於是哪裡有希望，就到哪裡。**」（G: para. 137）最後他在台北找到希望並定了下來。他在朋友的支持下自營水果攤的生意。訪談接近尾聲時我詢問工作對他的意義。他用一種極為素樸的表達方式說出令人動容的話。

（可是你還是想去工作。你想去工作除了...當然...收入會更高之外，有沒有別的...）

我可以更健康。

（更健康，怎麼說？）

我看到了一些都比較正面的。就很像人家講說，我會看到他臉，他來跟我買東西，嗯很快樂，我也很快樂。(G: para. 461-464)

事實上，G 因無法自主呼吸必須隨時配戴氧氣機，經營水果攤必須耗費大量的體力對他來說，是不小的負荷。擺攤前他必須將朋友協助送來的水果仔細清洗，用刀切塊與醃漬後，再分裝成袋整齊地擺在攤架上。但是這樣的負荷相較於客人回饋所帶來的感動，根本不算什麼。客人快樂的表情是對他工作付出的肯定，這是他持續工作的最大動力，也是無依無靠的他現階段最重要的生存意義。當生存被賦予意義時，他才能過一種他所謂「更健康」的生活，不再像過去 15 年那樣，只是漫無目標地活著。

## 二、工作仍舊是謀生的手段：就業不穩定的生命困境

上段的文本分析似乎證立了「社會排除」論述對工作的預設：工作是值得追求的好東西。然而我們必須留意的是：這些受訪者所在的「工作」並不是所謂的「好工作」。從表 1 的整理可以看到除了 F 外，薪資普遍不高。也因此 8 位受訪者中除 F 外，幾乎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曾因長時間的就業不穩定而陷入經濟極度困厄的貧窮處境。這裡頭有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是：假使不少受訪者能在工作中學習成長、發展自我概念、建立自尊並融入社會，那麼這些好處是否足以「抵消掉」惡劣工作條件對受訪者生命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呢？

從文中的分析結果，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相較於歐洲，台灣所得維持體系並不完備，因此「工作」在台灣社會作為「謀生手段」的效果更強

烈。這意味著：惡劣的工作條件，包括過低的薪資或者僱主因為沒有訂單而暫時歇業等等，都會讓當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立即陷入困境。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生活困境並不單純是三餐無法溫飽的貧窮問題而已。首先，透過訪談文本的分析，我們發現貧窮處境對受訪者人生所造成的後果並不侷限於經濟資源的短缺。此外低薪與就業不穩定也迫使不少受訪者嘗試透過「多兼幾份工」的方式來增加家庭收入，但這卻使得他們陷入「所得貧窮」與「時間貧窮」的雙重困境；時間貧窮的困境突顯了工作作為「勞務負擔」的意涵。下文將分三點對這些生命困境進行討論。前面兩點是針對貧窮處境對生命的影響，最後一點則針對所得與時間貧窮的雙重困境。

## （一）貧窮對生命的影響是全面性的：沒錢可以逼死人！

我們在文獻回顧曾指出「社會排除」這個概念對「貧窮」概念的取代，原因即在於傳統上，「貧窮」一詞對人們生活困境的描述與分析過度專注在經濟面向。訪談文本相當程度證立這樣的批判。從不少受訪者自我揭露的故事，我們清楚地看見：貧窮對於一個人生命的影響竟是如此「全面」（comprehensive）。

極度的經濟困厄很容易讓當事人對生命產生重大的挫敗感，這樣的挫敗感不只令人陷入嚴重的情緒低潮，甚至會讓人失去活下去的意願。事實上，受訪者中就有幾位不諱言自己曾有輕生的念頭。訪談時 G 每每回想起那段四處漂泊的日子，就激動到落淚，幾乎無法言語。我還記得他語帶哽咽地告訴我那是種「很痛」的感覺。「痛」到深處時，他坦言他也曾經「想放棄」（G: para. 168-172）。而那位熱愛工作的受訪者 A 甫投入保險業務時有長達半年期間一張保單都賣不出去。當時的她對未來感到萬分茫然，每天進辦公室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也是在那時她因持續半年完全零收入，開始向朋友以及銀行借錢，好維持自己與小孩的基本支出。

對未來的茫然與積欠的債務曾讓她「真的快想不開」（A: para. 535）。

居住在南投山區原住民部落的受訪者 C 也有相近的經驗。妻子剛過世那幾年是 C 人生最困厄的時候。C 原本在高公局擔任除草僱工。那份工作的地點雖遠離部落導致他得和家人分隔兩地，但收入相對優渥與穩定，一個月「如果做到二十六天的話，最起碼還有到三萬四萬這樣左右」（C: para. 190）。妻子過世後，由於身兼養家與照顧孩子的任務，考量部落至少有親人可以提供托育服務，他放棄除草僱工的工作遷回山上定居。但部落缺乏穩定的工作機會，他只能靠著耕作、並利用農暇時到處打零工，勉強養活自己與孩子。10 多年過去了，C 在訪談時回想到過世的妻子仍忍不住紅了眼眶。甫失去妻子的心理創傷及照顧三個孩子的壓力，再加上工作收入極不穩定，每天再怎麼努力工作仍舊很難賺到足以維持一家 4 口開銷的所得。內外煎熬下，C 有將近 3 年時間處在極度憂鬱的狀態。那段時間他一度想把三個孩子出養；最糟糕的時候甚至動了自殺的念頭。

這種令人萬念俱灰的挫敗感，往往源於對社會的不適應。C 在談及部落青年的無業問題即有類似的洞察，他用略帶玩笑的口吻感歎著：

> 因為你看年輕人都外流啊！這樣子看…這樣子看禮拜六、禮拜天看得到年輕人嗎？對，出去了，都小孩子跟老人，沒有年輕人哪！啊年輕人在幹什麼？沒有工作的，就是整天酗酒…我們○○村是比較算品質比較好一點點啦，一點點而已啦[笑聲]。…因為我們我們的年輕人喝酒不會在路邊，不會在路邊喝，他們都會躲起來，嘿，啊像別村的話，哇，整條整條路，只要你到那邊去看，哇，這邊一堆，那邊一堆，就這樣子喝，那就是因為沒有什麼…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只是整天在那邊[嘖聲]，不曉得在幹什麼（C: para. 661）。

由於欠缺創造工作機會的產業，部落年輕人若要穩定就業，就得遷

徙至都市才有出路。然而遷徙到都市後不代表一帆風順。劉千嘉與林季平（2008）根據 2000 年的戶口普查資料分析原住民重複遷徙與回流遷徙型態，指出：不同特質者的原住民，回流遷徙的機率並不相同，這當中教育是重要的篩選機制。就跟漢人的遷徙模式一樣，人力資本低者回流遷徙的可能性遠高於人力資本高者。都會區的勞動市場競爭激烈，贏者或許順利在都市生根並為自己與下一代掙得更好的生活機會；而被淘汰的輸家因為負擔不起都會區昂貴的生活費用，只能回流遷徙至部落。於是就像 C 所觀察到的，最後留在部落的年輕人有很高比例都是因為出外工作受挫的回流遷徙者。不過就算回到原鄉，他們只能找一些臨時性的工作。找不到穩定工作的挫折感讓很多年輕人沈淪在酒精的世界。

就業困境引發的社會適應問題不只發生在 C 所看到的部落年輕人身上。那些缺乏產業創造大量工作機會的農村地區，同樣存在不少因外出工作受挫的回流遷徙者。受訪者 E 的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E 是南投某金針菇種植場的作業員，約訪當下她的先生已過世三年，但訪談時 E 說起先生仍難過到眼淚停不下來。E 先生最先在台中的工廠操作堆高機。但孩子出生後，他在工廠的工作就斷斷續續。最初是因為和老闆在薪資額度的認知不同而離職；轉到另一家工廠後，最終也因為工廠外移而被遣散。第 3 個孩子出生後 E 的先生終於因連續的工作受挫經驗而搬回老家南投定居。[13]回流遷徙回南投後，處境並未改善。他向銀行借貸籌措資本，在自家的土地種植青椒，想藉此一舉翻身，但並未如願。E 說後來「阿青椒又遇到颱風啊把它掃得平平的，所以就負債一…一…一屁股的負債啊！」（E: para. 258）E 的先生之後再也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除了偶爾打零工外，沒工作時「就一堆朋友在家裡喝酒」（E: para. 252）。長年累月的酗酒搞壞了身體，最後還失去生命。E 告訴我：先生在世時，她經常為了他不去工作成天喝酒和他吵架。她與先生的婚姻關係瀕臨瓦解，連孩

[13] E 當時就帶著孩子依娘家而居，靠著娘家人的接濟與接一些家庭代工維生。

子都察覺出她身在其中的痛苦。她坦承當時曾想拋家棄子一走了。但對孩子的責任感還是讓她捨不得離開這個幾乎讓她萬念俱灰的婚姻。

> 我常…我常常跟我女兒說，我要不是被你們三個綁著，我早就跑掉了。啊我女兒跟我說，不只綁著而且是打死結。我女兒那時候國小五六年級就跟我說你為什麼不離婚？[抽泣聲]（E: para. 470）

E 的先生令人惋惜的故事及 C 口中那些留在部落整天酗酒的年輕人，突顯了：長期處於就業不穩定的困境對當事人的內在衝擊是多麼地深刻。它深刻到甚至可能導致當事人失去社會適應能力。當一個人因長期的就業困境而有酗酒之類的社會適應問題，這不只是當事人的生命品質受到威脅而已，就 E 的例子而言，婚姻伴侶的生活福祉同樣受波及，並連累無辜的孩子。

## （二）所得維持給付是絕處逢生的關鍵！

如果貧窮處境對一個人的生命所造成的衝擊如此全面，那麼反過來說，這似乎也意味著：所得維持給付的適時提供，對領受者的效果與意義並不侷限於「經濟層面」。檢視訪談文本，A、C 及其他的受訪者最後之所以能從人生最低潮走出來，所得維持給付提供的基本生存保障，對一些曾經身處極度困厄的受訪者來說，往往是「絕處逢生」的關鍵之一。這當中 G 的故事最富戲劇性。G 之所以能擺脫四處流浪的生活模式，在台北安定下來經營水果攤生意，過一種他所謂「更健康」的生活（G: para. 462）；讓他生命峰迴路轉的起點，正是在台北就醫時透過醫院社工的協助取得「身障」與「低收入戶」的福利身份。有了這兩個福利身份，G 即便沒有工作仍舊有固定補助作為基本生計所得。這些補助對他來說，是重要的「安全感」來源。肺功能嚴重缺損，必須配戴氧氣機才能維持日常功

能，G 可以選擇的工作並不多。[14] 同樣因健康狀態的限制，G 每天擺攤的時間相當有限，這使得擺攤收入非常不穩定。如果沒有政府給的補助，他根本無法單憑擺攤賺的錢活下去。在訪談時，談到關於「補助」的重要性時，他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他說：

> 沒有，我就全部垮掉。（G: para. 394）
>
> 我也是為錢啊，也是為心態啊，都有啊。因為像我來講，我對補助來講是不夠，真的是不夠，啊變成說我還是要去那個[工作]啊。只是說補助對我很重要。
>
> （很重要？）
>
> 因為以我個人的例子來講，我隨時什麼時候不能工作，我不曉得。人家說我現在也在挫著等。（G: para. 540-542）

對 G 來說，政府提供的相關補助額度儘管不算高，但卻是他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假使把這些補助抽掉，他安穩的生活便一夕崩解。

就工作的非金錢好處而言，身障津貼、生活扶助金、或者失業保險給付的領取並不能解決一個人失去工作後，不知如何定義自己與喪失尊嚴的內在困境。然而，當代社會仍舊有許多重要的資源與機會得透過現金來取得。最基本的吃穿住，樣樣都得花錢。政府各式名目的現金補助，至少可以確保一個人在缺乏穩定工作收入的情況下倚靠這些現金補助解決最基本的吃穿住問題。對身處極度困厄的人來說，這是很重要的安全感來源；而這種安全感，往往是他們從谷底向上爬的重要心理力量。

## （三）所得貧窮與時間貧窮的雙重困境

[14] G 在經營水果攤前，曾透過朋友的介紹到網咖幫忙打雜。但網咖成天彌漫著客人的二手菸反倒導致他健康惡化；再加上他得定期到醫院複診，或者天氣變化導致身體極度不適需要在家休息，經常請假也讓老闆質疑他對工作的投入。G 發現：唯有自己經營小本生意，他才能自主地配合自己的健康狀態與就醫需要，調整自己的工作節奏。

由於工作薪資過低，這使得不少受訪者必須同時保有兩份以上的工作才足夠維持一家的基本生計。受訪者 A、C 與 H 幾乎在某段時間都必須靠著兼兩份差，才能避免陷入「零收入」的困境。以 A 來說，她在懷孕期間結束童裝店生意後，保險業務算是中斷工作後重返就業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後來透過朋友介紹進入殯葬業，無論是任職於禮儀公司推銷生前契約、離職後與朋友自組葬儀社承接一些葬儀工作，她都不曾中斷保險銷售的工作。就像前面說，這兩份業務性工作的收入都不穩定，業績差的時候，兩份收入加起來平均一個月勉強達兩萬元的水準。H 自營服裝修改到後期，他的父親過世了。因為父親是主要家計負擔者，他不忍再讓南部老家每個月接濟他一萬元，有段時間曾利用晚上到加油站打工。住在南投縣原住民部落的 C 除了持續投入土地耕作外，由於農作收入太過微薄，他幾乎只要部落附近有打臨時工的機會都不放過。我與他碰面時，他當時還透過政府擴大公共就業方案，擔任「山林守護」短期工。儘管 C 投入如此多的時間在勞動上，但由於每份工作的收入都不高、也不夠穩定，他仍舊難以憑著勤奮工作而脫離貧窮。

A、C 與自僱期間的 H 之所以必須兼兩份以上的差事，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的工作囿於薪資結構採論件計酬、或者為自僱形式，沒有雇主的底薪作為基本收入保障，他們只好靠多兼一份工作來解決收入不穩定期間的所得來源問題。但就算工作收入穩定，但在都會區家庭消費支出逐年增加的情況，除非這份工作的薪資水準極高，否則一個家往往很難單憑一位養家者的工作所得而能支應全家人的基本花用。

B 夫妻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所有的受訪者中，只有 B 這個案例是夫妻一同接受訪談。當初研究助理約訪的邀請對象是 B，我與 B 約定周間日晚上在他住家附近的速食餐廳碰面，最後 B 與太太帶著最小的孩子（年約四歲）一同赴約。在訪談期間，B 就像典型男性受訪者那樣，對於我的提問雖有問必答，但答案極為簡短，總需要太太在旁作更多的補充，因

此整場訪談下來，太太反倒成了主要的受訪者。也因為如此，在整理與分析 B 的訪談文本時，我同時放進 B 與太太的經驗和感受。B 夫妻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在於：他們一直採雙薪的家庭經濟型態，因此當 B 囿於家庭因素從桃園遷徙至台北而持續半年時間找不到工作時，整個家還能靠著太太擔任會計的穩定收入過日子。但太太告訴我因為扶養三個小孩，老大老二都就讀國小需要補習，最小在唸幼兒園，教育費用負擔並不算小。她強調先生未失業前，家裡有兩份收入時，

> 就...就差不多打平啊。啊有時候真的不夠的時候我再跟我妹妹先借一下，啊然後因為我們大概有年終獎金，呵，再...再還這樣子...（B: para. 433）

因此，當先生將近半年時間找不到固定工作時，整個家立刻陷入捉襟見肘的窘境。B 夫妻後來是靠著政府提供的福利資源才捱過來。雖然現在 B 已經有穩定的工作，但說起三個孩子的教育支出，太太甚至期待先生能夠利用晚上下班的工餘時間再兼第二份差。B 太太的期待反映了：對於那些孩子尚處於就學階段必須支應補習、托育等費用的年輕家庭來說，即便有兩個養家者的收入，在兩份薪資水準不算高的情況下，僅能夠勉強維持家庭收支平衡。也因此 B 的太太期望 B 去兼第二份工作，她很清楚先生兼差會加重她對孩子的照顧與教養負擔，但為了多存錢作為孩子未來的教育基金，以及為日後買房子作準備，她覺得這樣的犧牲是值得的。B 夫妻即便擁有兩份穩定收入家庭收支只能勉強打平的事實突顯了：單親家庭的困境。無論是男性單親、或女性單親因為家庭結構的限制都只能有一位養家者的收入。除了少一份收入，家庭的支出被迫緊縮才能維持收支平衡外；倘若唯一的養家者再遭遇失業變故，在缺乏另一份養家者的收入作為基本收入保障的情況下，整個家立即陷入經濟困境。

當低薪工作者必須藉由同時兼任兩份以上的工作才能賺到足以養活一家老小的收入，這樣的事實反映出工作貧窮者的雙重困境。一方面，

由於兼任的工作多屬低薪工作，他們不見得能藉由多份工作收入的加總而擺脫「所得貧窮」的困境。另一方面，多份工作的兼任也使得他們對工作**之外**時間的自由支配大幅度地減少，因而陷入「時間貧窮」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時間貧窮」不只對低薪工作者本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質造成影響：倘若低薪工作者育有未成年子女，「時間貧窮」困境還可能剝奪掉低薪工作者陪伴與照顧孩子的機會，而對他們孩子的福祉造成的損害。受訪者 C 就是很好的例子。C 妻子是在九二一地震那年過世，當時三個孩子年紀都很小，老三才九個月大還包著尿布。當時他為了多賺些錢會到外地打零工，但因為請不起保母，有時候只得放孩子單獨在家過夜，讓大的孩子照料小的孩子。他開玩笑地跟我說：

> 有時候啊...有時候就叫大的：你就在家裡照顧，嗯，不要包尿布沒有關係讓他[笑聲]穿褲子就好（C: para. 256）。

C 當然清楚這不是對孩子最好的照顧安排，但是為了活下去這也是萬不得已的策略。弱勢家庭的孩子因父母必須長時間投入工作，其福祉可能遭到的損害並不僅止於 C 例子中的照顧安排問題。Esping-Andersen（2002: 49）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一個人在勞動市場的表現是取決他的認知與學習能力。但這項能力往往植基於童年時期其父母的陪伴與教養。從這個角度來看，低薪工作者的「時間貧窮」困境往往也侷限了其子女向上社會流動的可能性。

總的來說，受訪者因為兼多份工的「時間貧窮」困境提醒我們：無論工作能為當事人帶來多豐富的非金錢好處，它對當事人仍舊是一種「勞務負擔」。因此當一個人投入過長的時間到工作上，它還是會對當事人的身體與心理健康造成傷害，甚至危及其家人的生命品質。

## 三、「工作」的外在結構：被高度「商品化」的勞動力

前面兩小節，我們從微視層面去探究工作對受訪者的內在意義、以

及惡劣的工作條件對受訪者生命所造成的影響。在最後一節，我們想將視角拉遠，就受訪者所在的勞動市場結構去思索：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受訪者們一直無法脫離工作所得不足的低度就業困境？

從訪談文本表面上的文字作歸納，主要的原因似乎是他們的人力資本不足，導致他們現階段從事工作多屬專業性低以及技術門檻不高的低薪工作，如工廠的作業員、或行政助理。然而，更進一步去檢視每位受訪者的勞動條件，我們發現從受訪者提供工作收入資料，有些人工作一整年下來，平均的月薪資水準甚至是低於現行勞動基準法對「基本工資」的規定。其中一項因素跟「工作所得結構」有關。我們的受訪者中有 6 位是受僱於人，1 位是自僱者，1 位則是小農工作者。無論就業身份為何，他們共有困境在於：相較於那些受僱大型企業或政府部門的就業者，這些受訪者所在工作的所得結構普遍缺乏「基本收入保證」的機制。當然「基本收入保證」機制對不同就業身份者，運作方式並不相同。受僱者主要受制於雇主是否甘願承諾給他們「底薪」保障。但自營小本生意或小農工作者原本就沒有固定雇主，因此他們沒有底薪保障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對工作的付出是否可以賺得足以養家的收入，關鍵在於：工作成果能否在通過競爭的考驗，在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鑑於這樣的差異，下文分三點呈現文本。

## （一）受僱者：沒有底薪的薪資結構

關於這次田野有幾個畫面令我印象深刻。我記得：有不少受訪者被詢及「工作收入」時而面露難色。和他們深入訪談後，我才明白令受訪者的「面露難色」的原因並非他們沒有意願提供答案，而是出在他們所在的「工作」的本身：他們老闆並沒有提供底薪保障的承諾，這使得他們每個月的工作收入會因為當月的業務量與成果量、或者實際投入工作的時數與天數而出現極大的變化。因此他們無法透過一個簡單明瞭的數據來回

答關於「工作收入」的問題。

總的來說，6 位受僱於人的受訪者中，有 3 位的工作沒有「底薪保障」。他們的薪資是採論件、論日、論時或論業務量的計算方式。例如在金針菇種植場工作的 E 被詢及「工作收入」時，她同樣沒給我一個明確的數據，而是提供 1 到 3 萬元幅距如此寬的答案。她向我強調種植場給薪是採「論日計酬」，有上班才有薪水，但是能不能上班不是她自己決定的，而是看農場養菌的狀況及接單量：

> …啊它是養菌啊，養的不是很好，所以…所以它營運不…不…營運不好啊。所以我們常常說也還有大小月。大月就是接近過年的時候就就大月，那時候就每天加班每天加班這樣子。啊小月就是過年之後，夏天啊，就比較小月了。我們就這樣休息一下。（E: para. 30）

這種無底薪工作除了常見於 E 所在的這種資本規模小及營運狀況不佳的中小型工作組織外，更是業務性工作的普遍現象。在台灣，多數的業務性工作都不提供底薪，業務員是以商品銷售的佣金作為收入。業績好的超級營業員，很可能一個月有數十萬元以上的收入。但是純粹由業績決定收入的薪資結構，等同完全放任薪資取決於受僱者在市場的競爭力。市場競爭的成功者固然可以得到豐厚的金錢報酬，但競爭失敗的人卻連糊口的收入都沒有。A 就是極端的例子。她的兩份差事皆為業務性工作。說起自己兼了兩份工、幾近全年無休地跑業務的收入狀況，她很無奈的表示：

> …我以前在工廠上班的那個董事長的老婆，我如果去找他們，她會說：啊你現在在做保險跟葬儀，妳一個[月]到底賺多少？因為她也滿關心我的，然後說到底有沒有 20 萬，一年下來。我都不敢講[笑聲]。
>
> （所以有時候一年沒有那麼多？）

嘿啊，我就跟妳講有時候我一年搞不好才接幾件而已啊，嘿啊，接兩三件，兩三件，一件妳給它切兩萬塊的服務費好了，才多少錢。（A: para. 291-293）

事實上，A 甫投入保險業務工作時就有將近半年的時間賣不出一張保單。最後她為了維持自己和小孩的生計在向周遭親友都周轉過已「借無可借」的情況下，被迫用信用卡向銀行借款。這些卡債到後來成了她最大的惡夢。儘管她後來靠著意志力捱過幾乎「零收入」的那半年，但積欠卡債的財務紀錄卻成了她向上流動到有底薪工作的最大阻礙。[15]

## （二）自僱者：市場競爭的風險

過去台灣在經濟起飛的年代，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階級往往透過「黑手變頭家」，轉為經營小本生意的「自僱者」而向上流動（謝國雄，1989）。然而從幾位受訪者的經驗，我們看到了自僱者在經濟安全上的風險。以 G 為例，G 的水果攤生意扣除掉成本後，一個月平均收入約兩萬元。但是 G 在講出這個數據後，向我強調還是看「當月的身體狀況」（G:

[15]台灣社會普遍於「卡債族」存在強烈的負面刻板印象。媒體用「卡奴」、甚至「卡賊」來稱呼他們，並將之描述成無法克制物欲、過度消費的拜金者。但是根據夏傳生（2008: 55）的問卷調查，信用卡債務人欠債最主要的原因幾乎和 A 同出一轍，「失業」（57%）佔最高比例，其次是「離婚」（16%），而非大多數人想像的「過度消費」。典型的卡債族就像 A 一樣，主要集中在中下社會階層。他們往往因為重大人生變故，又無法取得政府補助，才被迫舉債度日。這些人積欠龐大的卡債後，面對銀行各種逼迫還款的手段，有的人即因為承受不了償還債務的經濟與心理壓力而自殺。事實上，A 在訪談時即坦言她有段時間就很想用自殺逃避所有的問題。在 2005-2006 年的「卡債風暴」期間，信用卡貸款債務人因為債務壓力而自殺的新聞時有所聞。吳宗昇（2010）曾經對 2005-2009 年間新聞料庫的進行統計，據他估計，這段期間「直接」因卡債問題而自殺身亡的債務人就高達 173 人，而這數據還未涵蓋其他那些未被報導的自殺案例。不過，就算鼓足勇氣活下來面對債務，多數債務人就像 A 一樣，因為雇主對「卡債族」的偏見，而無法找到穩定的工作，只能屈身於次級勞動市場部門。微薄且不穩定的工作收入，再加入有一部份的薪資必須用於償還債務；很多人就像 A 一樣，幾乎看不見脫離貧窮的希望。

paras 390）。冬天若寒流來氣溫過低，他就算載著氧氣機連行動的力氣都沒有，更不用說到攤子上去清洗、醃製水果及接待顧客。因為 G 是自僱者，沒有人提供底薪的基本收入保障，他的收入完全取決於他當天是否投入擺攤工作。如果因身體狀況極度不佳連續一個月無法擺攤，那個月的收入就是零。

除此之外，自僱者的經濟安全風險也可能來自於市場競爭的結果。例如 A 在投入保險與殯葬業務前也是自僱者，她自己開了一家童裝店。但營運的狀況並不好。所以後來當她得知自己懷孕後，就以專心待產為由結束掉。還有本章一開頭提到受訪者 H，在服飾製造工廠的行政助理工作之前，曾經自營服裝修改店。我問他開店當時的收入，他略帶遲疑地向我坦承：「扣除掉成本然後房租的話其實還倒貼。」（H: para. 455）由於不擅於控制經營成本，他每個月店面的開銷將近 3 萬，因此儘管客源充足，每個月可以從顧客那兒收取將近 2 萬元的修改費，但扣除成本後他的服裝修改生意長期處於賠錢狀態。那時他是靠著南部家人的經濟支持才能維持生活上與店面經營上的基本開銷，而這也是後來他決定收掉店面轉投入現在行政助理工作的最主要原因。

A 與 H 的遭遇說明了：儘管經營小本生意是人力資本不足者就業、並藉此向上流動的便捷管道，但小本生意的經營同樣有市場競爭的壓力。就跟前述的業務性工作一樣，競爭成功的自僱者，可能像士林夜市一些著名的小吃攤，食客源源不絕，月入百萬。但競爭失敗的自僱者，不僅基本的生計成問題，甚至可能連當初投入的資本都回不來而落入負債的境地。

## （三）偏鄉小農：缺乏精良農業設備，小農收入有限

這次受訪者者有 3 位居住在偏鄉地區。相較於都會區，偏鄉地區缺乏創造大量工作機會的製造部門與服務部門產業，多數人只能從事跟農

業相關的工作。前面提到的 E 在金針菇種植場擔任作業員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 D 現在雖然在成衣廠擔任論件計酬的作業員，但在這份工作之前她也從事過採薑之類的農業僱工。這裡頭 C 最特別，C 在部落擁有自己的土地，只要待在部落生活，他一直保有自耕農的工作身份。然而這並不表示：C 自土地耕作中獲取的經濟安全保障，比 D 和 E 這類的農工要來得好。從底下 C 的訪談文本，我們將發現：上一節所描述的那種自僱者經濟安全風險不只發生在都會區小本生意經營者身上，也是偏鄉地區小農的困境。

我記得 C 接受訪談時不斷向我強調小農的收入非常低。以 C 自己為例，一年耕作兩期全年的收入還「不到二十萬」（C: para. 142-142）。C 認為自己耕作收入如此微薄的原因在於缺乏精良的農業設備。他解釋：

…現在的…現在的收入你有搭溫室的時候你才有賺哪！

（搭溫室？）

嗯，搭溫室。如果沒有搭溫室，這個露天的這個被太陽直接照射到的，那個就很難講[笑聲]，價…價格就有差。（C: para. 102-104）

然而像溫室這樣的農業設備並不便宜。對於連養活自己的都有問題的 C 來說，他根本沒有「本」去購買：

…喔，那個沒有，我們付不起，那一分地要六十萬。

（喔，所以要有本才行？）

對，啊像…像有一些他們或許是有那種…有那種…有那種…有那種實力，還是有那種能力的話他們去貸款。去貸款看一分地六十萬，他們去貸一百多萬這樣子去做。（C: para. 106-108）

以土地作為抵押品向銀行「貸款」或許是籌「本」的方式之一。然而那是有「風險」的。如果收成不如預期，不僅血本無歸；由於「本」是向銀行借來的，一但籌不出錢還款，作為抵押品的土地也跟著沒了。

…那個地，所有的地去抵押，嘿，這樣子，像我們原住民的還不

起的就把那個地就全部，哎那個什麼…哎法院…法院拍賣。(C: para. 110)

前文曾提到受訪者 E 已過世的先生，他的遭遇印證了 C 的論點。E 的先生當時種植青椒的資本包括青椒苗與設備，全是借貸來的。青椒田敵不過天災的威脅，颱風一來，將來不及收成的青椒全都掃平。E 的先生就像 C 所擔憂的那樣：血本無歸，最後靠著賣掉祖先留下來的土地還清債務。C 坦承自己就是因為承受不起失去土地的風險，只能採取最傳統的方式來耕作土地。所以他能選擇作物種類有限，往往是一些經濟性價值不高的作物；而且缺乏溫室這類控制天候不利影響的農業設備，作物的品質與產量很難提升。辛苦勞動一整年下來，耕作的收入少到難以維持一個家的基本開銷。也因為收入太過微薄，他在耕作之餘還得不斷地透過朋友找些諸如幫忙砍草、採收作物的臨時性工作，或者靠政府擴大公共就業的短期工作，才能勉強應付自己、及兩個尚處於求學階段的女兒的基本生活與教育支出。[16]C 的處境突顯了在缺乏精良的農業設備下，小農即便擁有土地，仍舊很難倚靠農作收入來維持基本生存。

綜合上述三點討論，顯然受訪者之所以陷在「有工作，卻仍舊貧窮」的困境，很大的原因在於：受訪者對工作的投入，並不能確保他們能夠從工作中獲取足以養活自己與一家老小的「基本收入」。我們認為這正是他們勞動力被高度「商品化」不可避免的後果。謝國雄在（1994: 93-94）在一篇對論件計酬工人的勞動意識進行分析的論文中曾指出：「沒有底薪」的薪資結構背後隱含著一種由「風險自負」之「擬小頭家意識」以及「有做有錢，沒做沒錢」之「純勞動意識」組成的意識型態。在這種意識型態底下，勞動被視作純粹由雇主（或者顧客）用錢交易的「商品」：既然是一種純然的商品交易，報酬的計算當然必須完全取決於勞動者的付出

[16] C 育有 3 名子女。老大是男孩，目前在洗車場工作。老二和老三都是女孩尚在求學階段。二女兒現在南部某私立技術學院唸書，二女兒則就讀國中。

與成果。在這樣的計酬邏輯中，雇主（或者顧客）並沒有義務透過所謂「底薪保障」的承諾，為勞動者沒有付出勞力的休息與休假時間、或者沒有任何實質產出的心力—比方說像 A 跑業務跑了半年，卻一份保單也沒賣出—付出費用。從雇主的立場，勞動力的高度商品化代表企業可以用極為彈性的方式去運用勞動力，將企業的營運風險相當程度地轉嫁到受僱者身上。例如，像 E 工作金針菇種植場那樣，養菌養不好時，或接單量不足時就停工，不給員工薪水。然而這並不是沒代價的。正如上述訪談本文所呈現的，勞動力的過度商品化往往讓勞動者及其家庭更容易受到貧窮的威脅。

## 伍、結語

本文透過對 8 位就業不穩定者的深度訪談去揭露低度就業者的生命困境。從訪談文本中，我們看見「工作」對受訪者深刻的內在意義：透過工作，受訪者可以建立對身份認定與自尊，並藉此過一種更有尊嚴的生活。但另一方面，我們發現由於台灣社會的所得維持體系並不像歐洲那般完善，對多數受訪者而言，工作仍舊是重要的謀生工具。因此就業不穩定與薪資過低的惡劣工作條件仍舊對受訪者及其家人的生命造成負面衝擊。從受訪者的自我揭露，我們體會到貧窮與長期就業不穩定如何深深地傷害一個人的內在，引發後續的社會適應問題，波及周遭親人。最後對訪談文本進行歸納，我們發現受訪者的工作貧窮困境，跟他們所在工作的所得結構普遍缺乏「基本收入保證」的機制。這樣的欠缺是其勞動力被高度商品化的後果。

接下來我們想回到本文一開始的提問。前文反覆地指出：低度就業者與長期無業者最大的差別在於：**低度就業者仍舊保有一份工作**，儘管這份工作的勞動條件並不甚理想。保有一份勞動條件不佳的工作，究竟讓低度就業者的生命品質因而被提升，還是被降低？從研究發現來看，

答案顯然並不簡單。原因就像我們在文獻回顧對「工作」社會意涵所作的檢視：工作既是一種「勞務負擔」，同時也是當代人藉以融入主流社會的重要生活機會。

## 一、透過工作的「內在好處」提升生命品質

不可否認地，本研究的受訪者之所以願意在條件不甚理想的工作崗位持續停留，養家糊口的現實因素當然是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之外，不少受訪者在賺取工作所得的同時，也從所在工作中體會某些相當深刻的東西：包括自我成長、發展自我概念或者建立自尊。這些東西對一個人的意義是金錢或任何物質資源難以取代的。哲學家 MacIntyre（1984）曾經將一項社會活動可能為當事人所帶來的好處區分成「外在的」與「內在的」。若套用他的觀點，一個人在工作中所賺取的現金所得就是工作的「外在好處」（external goods）。社會活動「外在的」好處以具象的物質資源呈現，它很容易被其它可以發揮相似功能的物質資源所取代。因此長期無業者雖然失去工作帶來的現金所得，但國家可以透過所得維持給付解決他們失去工作所得後的生計問題。相對照下，一個人在工作中得到的學習成長、身份認定與成就感，則是工作的「內在好處」（internal goods）。這種「內在的」好處並非具象的物質資源，是主觀的體驗與感受，必須由當事人對工作這項活動的「親身參與」才能獲得。這正是所得維持給付的侷限。國家的所得維持給付雖然可以讓失業者的生計安全獲得基本保障，但它卻無法彌補長期無業者因缺乏「親身參與」工作活動的機會而喪失那些「內在好處」。

回到生命品質的議題。低度就業者雖然所在工作的勞動條件不佳，但他們至少從對工作的「親身參與」中獲得某些內在好處。這樣的內在好處或許有助於增進其生活福祉。也正因為有這樣的可能性，所以當代歐洲開始透過「社會排除」的概念去關注與分析長期無業者在所得匱乏「之

外」的生命困境，並嘗試改變傳統所得維持體系的「消極性格」。

## 二、惡劣的工作條件對生命品質的威脅

不過，工作作為社會活動的複雜性，除了在於它能為當事人帶來那些現金給付難以取代的「內在好處」外，我們終究不能忘了：它還是一種佔據當事人時間並耗損其精神力氣的「勞務負擔」（labor burden）。從工作作為「勞務」的角度來看，一個人所在工作的條件是否合理，同樣影響他的生命品質。

本研究的受訪者們儘管持續停留在勞動市場，保有一份工作，然而勞動市場提供給每位就業者的條件並不平等，就訪談資料來看，他們受到的對待顯然普遍低於整體就業者的平均值。套用前面引用過的 Tipps 與 Gordon（1985）的論點，這群受訪者們雖未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卻被勞動市場「內部」的不平等所排除。文本顯示：這種被勞動市場「內部排除」的遭遇，已經對他們的生活福祉造成或多或少的傷害。僱用關係不穩定及工作所得不足讓不少受訪者飽受貧窮的威脅。要命的是：貧窮對一個人及其家庭的衝擊並不侷限於經濟資源的匱乏，從受訪者所揭露的經驗，它對生命的影響比一般人想像得要全面。好幾位受訪者不諱言自己一度幾乎被「錢」逼到絕境，想一死了之。此外就算未被逼至絕境，就業不穩定與經濟壓力，也可能對一個人的內在產生負面的衝擊，衍生像酗酒、或家庭暴力這類的社會適應問題。我們的受訪者中即有人引用至親和同部落年輕人的故事說明這樣的可能性。像 E 先生如此極端的例子也說明了：當一個人因長期工作不穩定與貧窮而出現社會適應問題，不只是本人受害，其家人的生命品質亦遭嚴重威脅。

## 三、透過所得維持給付解決勞動力被高度商品化的後果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2），2012 年的就業人口中「每週工作時數低

於 35 小時，但希望再增加工作時數者」佔 2.53%，「工作收入低於截略點或基本工資者」佔 8.19%。「低工時」與「低所得」的低度就業人口合計粗估的人數約 116 萬 1 千人左右，這個數據是失業人口的兩倍以上。中下階層民眾就業的比例似乎比想像中高，只不過他們因為人力資本薄弱、身障、中高齡、或家庭照顧因素，普遍被侷限在就業型態不穩定的「邊陲性工作」。這些工作不只薪資水準低。如文本所揭示的，它的薪資結構經常採論件、論日、論時或論業務量的計酬方式，就像自僱者與小農工作者一樣，缺乏基本底薪的保障。此外受僱者與雇主之間的契約關係也不像傳統勞雇那般穩固，往往是「臨時性」：雇主不提供長期性的工作機會保證。而且也因為是臨時性的契約關係，有給薪休假或者退休金的保障，雇主也能免則免。總的來說，相較於那種長期性、且提供底薪的工作，邊陲性工作的勞動條件結構對勞動力的「商品化」程度更為徹底。

邊陲性工作的出現與擴張，有部分原因就如我們在文獻回顧中提到的：是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趨勢迫使雇主必須採取更為彈性的人力策略以因應競爭更加激烈的全球市場。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崛起（neo-liberalism）導致越來越多國家鬆綁對勞動市場的管制，也創造出有利於雇主採取彈性人力策略的制度環境。事實上因為缺乏工會組織對雇主力量的制衡，台灣社會對勞動市場的管制向來不若歐洲國家那般嚴格。勞動基準法雖有最低工資及解雇的規定，然而就實際狀況，台灣雇主會透過各式的策略去規避勞基法的管制。的確從總體經濟的角度，勞動市場管制的鬆綁有助於工作機會的創造。但它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往往是穩定性低與薪資低的邊陲性工作。如此，失業問題雖然被緩解了，但卻創造出大量處在低度就業狀態的工作貧窮者。

面對這些因為邊陲性工作擴張而持續成長的工作貧窮者，政府能做什麼？首先，當政者首先應該破除迷思，不再將「壓低失業率」視為其就業政策的首要目標。在評估就業面向的施政成果時，除了失業率指標外，

工作貧窮者的人口規模及其處境也應受到同等程度的看重。行政院主計處在每年出版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都會估計出當年度「工時不足」與「低所得」的低度就業者人數及其佔就業人口的比例，不過這幾個數據受當政者重視的程度遠不如失業率這項指標。另外台灣的工作貧窮者與現行社會救助體系中的「中低收入戶」其實高度重疊。過去內政部（也就是現在的衛福部）會定期針對「低收入戶」進行調查瞭解其生活狀況與需求，從 2013 年起這項調查已經將「中低收入戶」納入調查對象，擴充為「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勞政部門未來可以參考調查結果去掌握工作貧窮者的處境以及他們對就業服務的特殊需求。

其次，政府應該針對工作貧窮者建構更完善的所得維持體系。所得維持給付的提供，至少能夠相當程度地緩解受僱者的勞動力被過度商品化後其生命所受到的負面衝擊。本研究的幾位受訪者回想起自己如何從人生最低潮走出來的經歷時，他們都強調：所得維持給付的申請與領取是其絕處逢生的關鍵！過去我們國家的所得維持體系相當殘補，過分著重在那些不具備工作能力的人口群。那些針對勞動人口的現金給付項目相當有限。近年來的一些變革包括：放寬社會救助的領取資格，將「中低收入戶」的福利身份法制化，讓那些具備工作能力者也能適度受到扶助；以及發放育兒津貼。都是值得繼續深化的政策走向。

最後，工作貧窮現象的存在惡化追根究底，是勞動力被高度商品化的後果。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政府或許應該認真地思考：台灣社會應該繼續放任一些雇主用如此商品化的方式來對待勞動力？

# 參考書目


行政院主計處（2012）《101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處網頁（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2738&ctNode=3579&mp=4）。

夏傳生（2008）《塑膠鴉片：雙卡風暴刷出台灣負債危機》。台北：行人。

徐宗昇（2010）〈雙卡債協商模式與不對等情境〉。論文發表於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主辦），《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實務運作檢討暨修法展望研討會》（12月18日）。舉辦地點：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黃冠穎、游玉卿、李孟壕（2001）〈變遷中的勞動市場：論台灣低度就業之現況〉。《資料社會研究》，第1期，頁229-255。

劉千嘉、林季平（2008）〈臺灣原住民的回流及連續遷徙：2000年戶口普查分析〉。《地理學報》，第54期，頁1-25。

蔡憲唐、韋伯韜（2004）《人力低度運用方法之研究》。行政院主計處委託研究報告(RES-93-01)。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蕭霖（2003）〈教育與職業不對稱的模式探討〉。《教育政策論壇》，第6卷第2期，頁43-67。

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期，頁11-54。

謝國雄（1994）〈勞動力是什麼樣的商品？計件制與台灣勞動者主體性之形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7期，頁83-119。

顏敏娟、葉秀珍（1997）〈臺灣地區教育與職業不對稱階層化變遷之研究：1979與1996〉。《國立中正大學學報》，第8卷第1期，頁37-71。

Barry, B. (1998) Social Exclusion, Social Isol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CASEpaper 12, 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London Social of Economics. Retrieved Mar. 20, 2014, from: http://sticerd.lse.ac.uk/case.htm

Bhalla, A. S. and F. Lapeyre (2004) Poverty and Exclusion in a Global World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Clogg, C. C. and T. A. Sullivan (1983) Labor Force Composition and Underemployment Trends, 1969-1980.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 117-152.

Clogg, C. C., T. A. Sullivan, and J. E. Mutchler (1986) Measuring Under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in the Work Force. Social Indicators, 18: 375-393.

Dooley, D. (2003) Unemployment, Underemployment, and Mental Health: Conceptualizing Emloyment Status as a Continuum.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2(1-2): 9-20.

Elster, J. (1988) Is There (or Should There Be) a Right to Work?, in A. Gutmann (ed.),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pp. 51-78.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riedland, D. S. and R. H. Price (2003) Underemeployment: Consequences for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W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2(1/2): 33-45.

Grzywacz, J. and D. Dooley (2003) "Good Jobs" to "Bad Jobs": Replicated Evidence of an Employment Continuum from Two Large Survey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6: 1769-1760.

Halaby, C. N. (1994) Overeducation and Skill Mismatch.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7(1): 47-59.

Hauser, P. M. (1949) The Labor Force and Gainful Workers—Concept, Measurement, and Compar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4(4): 338-355.

Hauser, P. M. (1974) The Measurement of Labor Utilization: More Empirical Results. Malayan Economic Review, 22: 10-25

Hauser, P. M. and L. J. Shaprio (1999) Labor Force Measurements for the Census 2000. Proceedings of the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Section,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Retrieved Mar. 3, 2013, from

http://www.amstat.org/sections/SRMS/Proceedings.

Jahada, M. (1982)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ensen L. and T. Slack (2003) Underemlployment in America: Measurement and Evid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2(1-2): 21-31.

Katz, M. B (1989) The Undeserving Poor: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fa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Kieselbach, T. (2003) Long-term Unemployment among Young People: The Risk of Social Exclu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2(1-2): 69-76.

MacIntyre, A. (1984) After Virtue (2nd ed.).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University.

Mead, L. (1986) Beyond Entitlement: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Mead, L. (1998) Telling the Poor What to Do. The Public Interest, 132: 97-112.

Miller, T. (2005) Making Sense of Motherhood: A Nar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ore, W. E. (1953) The Exportability of the "Labor Force" Concep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1): 68-72.

Paugam, S. (1996) Poverty and Social Disqual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umulative Social Disadvantage i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6(4): 287-303.

Peck, J. (2001) Workfare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Rawal, N. (2008)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A Review. Dhaulagiri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 161-180.

Room, G. et al. (1992) Observatory on National Policies to Combat Social Exclusion, Second Annual Report. Brussel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trieved Mar. 20, 2014, from: http://core.kmi.open.ac.uk/download/pdf/5092455.pdf

Saraceno, C. (2001) Social Exclusion: Cultural Roots and Diversities of a Popular Concep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Social Exclusion and Children', Institute for Child and Family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Retrieved Mar. 20, 2014, from: http://www.childpolicyintl.org/publications/Saraceno.pdf

Sen, A. (2000) Social Exclusion: Concept, Application, and Scrutiny. Social Development Papers No. 1, Office of Environ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Retrieved Mar. 20, 2014, from: http://housingforall.org/Social_exclusion.pdf

Tseng, S. Y. You, and C. Ho (2002) New Economy, Underemployment, and Inadequate Employment. Journal of Cyber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2): 215-237.

Tipps, H. C. and H. A Gordon (1985) Inequality at Work: Race, Sex and Underemploymen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 35-49.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son, W. J.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Alfred A. Knof. Inc.